

平反六四 還政於民

六四 15 周年

1989
~
2004

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
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人大釋法之後
中央收緊港人的自由權利
台灣總統大選評析
“六四”十五週年看新的鬥爭
資本主義化帶來日增的惡果
世界輿論譴責以色列侵略
建立不同的歐洲需要有不同的左派

人大釋法之後

仲明

四月二十六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二零零七、二零零八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均不實行普選；而立法會的直選和功能組別選舉亦維持各佔半數的比例；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維持不變。

另外，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更首次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普選開列六項條件。當中包括，基本法第45條和68條已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應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行政長官由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任何改變，都應遵循與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均衡參與，有利於行政主導體制的有效運行、有利於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等原則。

同時，人大常委會亦進一步決定，在不違反這次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情況下，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可按照基本法第45條、第68條的規定、和附件一第7條、附件二第3條的規定，作出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適當修改。

最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補充說：隨着香港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和進步，特別行政區的民主制度一定能夠不斷地向前發展，最終達致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和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還官僚一黨專政的本來面目

時至今天，相信沒有多少市民仍然會寄望在基本法的規限下，香港的政治制度還會有甚麼民主的前景。

事實擺在眼前，香港祇是彈丸之地，人口集中，普及教育推行數十年，傳播媒體中外皆是，通訊設施更是亞太地區的中樞之一。據報導，香港在應用電腦資訊科技方面，更是位於世界前列，連上網的費用也幾乎平通全球。這一切均顯示，市民無論從基礎教育、接收資訊、資訊流通等領域，均不亞於其它的先

進地區。但偏偏卻要忍受從外加諸市民身上、從上頒佈下來的基本法。這本從來沒有經香港市民同意制訂的基本法，再經由人大常委會的所謂「合法」、「合理」釋法，把香港市民要求政制改變的低微願望也堵塞起來，還要被北京的中共官僚說成是在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民主！

中共中央的官僚所代表的，根本就是一黨獨大、人民的權利被置於紙上空文的境況。官僚統治的結果，經數十年來的實踐證明，祇是如寄生蟲般依附在過去的革命光輝之上；但實質上，中共官僚層，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中所衍生的貪污、腐化、濫權，敗壞社會主義革命的名聲，早已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不單止沒有任何進步的意義可言，而且更成為高高在上發号施令的統治層，處心積慮的，祇是如何維持中共官僚制、家長式的統治而已。

因此之故，這次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完全沒有令人驚訝的地方。一個祇顧維持其專權統治的利益集團，根本上已與國內人民嚴重脫節，其施政的重點顯然是如何顧及有權、有勢、有錢集團和階層的利益，而絕非如何可以體現一個更公正、平等，合乎人民福祉的社會。

此所以有論者也指出，香港今天所面對的困局，比中國內地的政治改革還要落後。舉例來說，中國農村基層早於17年前便已實行「直接選舉」，官方的數字顯示，截至1997年底，全國九成以上農村已實行直接選舉的制度。1998年11月，中共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確定「村民自治」已完成試行階段，開始正式實施。這份被譽為「小憲法」的組織法規定，村民有權在每三年一次的村幹部選舉中，撤換不稱職的村幹部。

當然，這種被吹噓為「草根民主」的制度，適用的範圍層次低，距離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均應由選舉產生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落差。但是，至少在農村，以至某些地區的鄉鎮範圍內，農民還是有選舉、撤換其代表的權力；這種情況，至少也比香港的政治現實好一

點吧。

不過，中共極權的官僚統治集團，在經歷了香港反二十三條、七一遊行等事變後，率先把中共行之有效的壓制人民的伎倆，拿到香港來應用，這種做法，完全是反民主、與人民為敵的。

建華七年之治

相比較之下，香港市民面對更惡劣的處境。

當年董建華宣佈競選連任，連政綱也沒有，他拋出來的祇是選舉宣言中的一些關注事項而已。隨後，他連論壇也避而不到，多番拒絕任何諮詢會的邀請。他的理由是已有一個800人的選舉論壇，就是這些有權選他的800人。

香港的特首，就是這樣地，在沒有公佈政綱、沒有讓市民質詢的情況下，又沒有競選對手的怪誕情況下，「被選」上台的。

接着下來，他倒行逆施，不單沒有處理好香港的經濟、社會、民生的問題，反倒過來，要强行通過他的所謂關乎國家安全的立法，在那幾個沸沸騰騰的月份裡，擺出處處與民為敵姿態。

社會大眾不是阿斗，心裡早就明白董特首服務的對象不是香港市民，而是要事事向北京交心。又正如那些從北京來的「護法」所言，香港祇是一個區區地方政府，何來權力改變基本法早就有規定的選舉制度、政治制度？

在北京官僚眼中，根本就沒有多少討論政改的餘地，否則就真的是太危險了。倘若香港市民可以用上街遊行、示威抗議來爭取民主，以至於在07年、08年普選特首、普選立法會，這些不單是一黨專政的家長式統治不能容忍；而且可以成為先例的政治變革，又會否引起國內的效尤，也是中共官僚必須思考的問題。

所以，說是董建華自編自導自演也好，說是中央直接干預也好，這一切都是一黨獨大體制下的必然結果。

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的前景
香港過去百多年的歷史，從來就沒有甚麼民主，

這是不爭的事實。殖民地制度下自然沒可能有民主，這不難理解。

但是在回歸祖國以後，一個号称「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卻奮力撲滅香港市民要求民主、要求普選的聲音，這就太不應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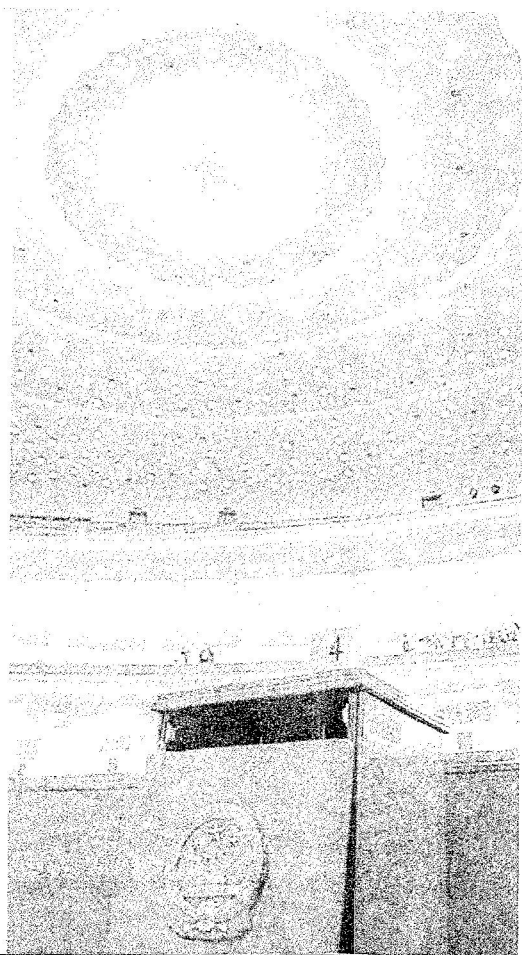
擺在香港市民面前的，已經不再單純是香港有沒有民主的問題。其實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何時才会有民主，何時才會結束一黨專政，何時才会有自治的工會、農會、學生會等組織出現？

這一切不單直接影響中國的工農大眾的前途和出路，也反過來說明一個道理：中國有民主、香港才会有民主的前景。

為全面普選的香港政治制度奮鬥到底！

為中國的自治工會、農會、學生會等奮鬥到底！

為結束一黨專政奮鬥到底！



中央收緊港人的權利空間

振言

2003年7月1日逾50萬港人大遊行反對23條立法，隨後區議會選舉民建聯慘敗，這兩件事敲響了民建聯的警鐘，預告出香港的親中共勢力可能在港人日益覺醒和爭取政治權利的行動中更加被排拒，自食其「保皇黨」的惡果，同時影響中共對香港的統治聲勢。

這個政治危機，使得北京當局必須嚴重關注，急謀對策。在7.1遊行之後，新任民建聯主席的馬力便公開指稱，中央對港的政策要收緊了。他這句話當然是有根據，而不會只是憑個人了解來說的。往後的一連串發展果然証實了他的話：

首先是由「四大護法」（特別是披着「法律權威專家」的御用「學者」狐衣、發言窮兇極惡的蕭蔚雲）時常發表公開談話，訓斥港人，製造輿論攻勢。

然後由人大常委會拋出「愛國論」（京官所要的「愛國」涵義或潛台詞就是愛中國共產黨），指示港人要投票給「愛國愛港」的政黨（即民建聯）。

跟着是更主動釋法，由中共指揮下的人大常委會作出，以企圖阻遏港人繼續討論和要求政改。它所稱的「釋法」，其實是修法，把基本法附件一的規定（關於07年以後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請人大常委會批准），主動修改為：如特首和立法會雙選舉辦法認為確需修改，行政長官應向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由人大常委會根據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予以確定。即是將是否需要修改和如何修改，變為中央掌握決定權。這顯然是企圖遏止港人要辯論更多的實行民主問題，漠視港人的意願。官方的辯護士解釋，雖然許多修改是基本法及其附件所沒有寫明的，但那是基本法起草人當時的原意，是基本法的重要精神。這亦即是把內地的人治而非法治、「政治凌駕法律」的做法實施於香港。它再指揮政制三人專責小組和特首越過立法會提出報告，定下政改的鳥籠和關卡。

07、08年雙普選的港人訴求。這個日子與15年前人民日報4.26社論（它把89年學生民主運動污蔑為動亂），都是在同月同日，這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專制政治下時有發生這類壞事的緣故。現時的粗暴決定，表現出中央對港人的民主訴求是多麼的害怕，怕民主選舉會選出代表民意的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壓倒了它在港的死硬支持者。

人大常委會這樣直接插手基本法列明原屬於特區範圍內的事務，是違反了中央所作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承諾，它原本只是在港人作出了07、08年的選舉安排之後，才有「批准」或「備案」與否的權力。它在作現時的決定之前，又沒有由港人討論，連它起草的決議草案也沒先行公布，徵詢港人意見，便專橫地迅速通過。在通過後才假惺惺地派員來港作假「諮詢」，完全顯露出漠視和愚弄港人的慣用伎倆。

這一連串做法，尤其是4.26的否決雙普選，使得港人非常失望、憤慨，特別令許多位努力研究政改出路的學者，對政府的諮詢死心，使宣稱代表八成研究本地政治學者的民主發展網絡，宣布杯葛港府的政改諮詢，只會在建制外發表意見。有學者含淚說：「大律師覺得不應該同政府講法律，學者不理政府的諮詢，是香港的悲哀。」民主派議員也決定「積極杯葛」政改諮詢，即無論政府提任何方案，也只會立法會要求普選。

看來，北京對港人自由度收緊的措施仍會繼續增加，越來越緊，這也反映出它對港人的不信任和疑慮日增。但越是這樣，反過來又勢必增加港人對中央當局的疑慮、不滿，要用手（投票）和用腳（遊行集會）來表達不滿和爭取權益。壓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這樣的惡性循環，也將會造成香港政局的動盪，社會更加分化，紛爭更多；從而也會影響大陸的民心，添加大陸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加劇中共的統治危機。

更厲害的是4.26的常委會決定，專橫地否決了

2004年4月25日

訂立最低工資法保障工人權益

微波

房屋署去年批出的外判清潔工人合約中，當中7份要工人每日工作7至9小時，但月薪低於3000元，部份更低至2450元。有立法會議員指清潔工月薪「市價」為5000元，房署的合約只及一半，低得可恥。食環署、康文署的外判清潔工人月薪，普遍亦只有4000多元。樂施會較早前揭發外判清潔工被嚴重剋扣工資，其中在黃大仙下邨工作的清潔工，每月薪金竟然只有2150元。

上引所揭露的事實，已存在多年，工人們都只好啞忍，間中有工人投訴的，便遭外判工辭退。作為最大僱主的香港特區政府所轄下的許多部門，為了節省開支，將過去直接聘用工人的工作紛紛改為外判，更盡量壓低工人工資，容許外判商再分判給二判、三判、四判……，以致工人被層層剝削。加上失業情況較嚴重，給這樣的無良僱主濫加利用，把大量的極度廉價的勞工壓在社會的底層。與此構成懸殊對照的，是政府高官享有月以十萬計的豐厚薪酬待遇。

社會底層的清潔工人這種悲慘情況，大概是在最近給許多香港報章報道後，迫得特首董建華表示關注，要有關部門採取「嚴格措施」，保障工人的權益，強調政府會儘快制訂最低工資和工時上限。當局也聲言須要在承判合約中列明各種條件以阻止承判商的非法剝削工人，例如列明最低工資金額及最高工作時數，由支票或銀行轉賬付款等。但事實證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承判商或判頭總會各種辦法，以迫使工人忍受在其應得工資被剋扣，簽假文件、收據給作證明等等；雖然這到底是犯法的行為，使承判商們不無顧忌，但仍然是很少實效的。

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等的立法是非常重要的，這仍可能幫助工人防止無良僱主或判頭們的任意剝削榨取，可以依法進行

抗爭，以至訴諸於法。世界許多國家在百多年前已有這類立法，《十月評論》一直以來都有這種立法的主張和要求。港府直至今天才被形勢所逼，在許多團體的壓力下，承認有必要制訂措施，但它對違反合約的承判商的「處罰」仍是很溫和的，只是罰款或下年暫停承標等，阻嚇力不足。

當局所必須採取的有效措施應該是：一、各部門的工作不再外判，而由有關單位直接僱用工人工作，從而減少中間剝削等弊害，保障工人權益；二、不能將公營事業私營化；三、立法明確規定最低工資金額；四、立法規定每日8小時工作，原來領取得的工資不減，並須按生活指數上升而增加；五、不能削減社會福利，等等。

在港府宣稱要制定外判指引，訂立最低工資（清潔工人月薪不少於4300港元）之後，却引起了一些學者在報章發表文章，指最低工資法「好心做壞事」、「加重失業」、「傷害香港」，等等，他們都是自由市場競爭的主張者，認為失業工人須要爭相接受更低的工資而不理法定的最低金額；僱主如以最低工資僱用較高學歷經驗能力的工人，會使低技術工人失業。但實際上，香港在某一時候要僱用工人的總數和失業工人總數，不會因為是哪類工人去做而有增或減。而由低技術工人做了，社會上的失業工人的總數還不是一樣沒有增或減嗎？可見那些學者所提出的理據和可能引起的惡果，是令人費解的。真實的因由是最低工資法的設立，會妨礙失業者互相壓低工資去爭奪職位，從而不能讓僱主坐收漁人之利，以不斷壓低的工資成本去賺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因此，上述的學者意見到頭來只會對僱主有利。

2004年4月28日

台灣總統選舉評析

軍行

民主的表現和局限性

台灣總統的選舉，表現出台灣人民能夠一人一票、相對自由地行使他們的選舉權利，直接選出多數人所支持的最高領導人。從投票前有許多次幾十萬以至百多萬人上街遊行集會的造勢行動，全島熱情投入，特別是投票日有8成以上選民踴躍投票，顯示出台灣人民爭取得到的這種民主權利，是非常可貴的。在他們行使選舉權利時，一般地說也是很自由的。舉例來看，據台灣一家人力資源公司在投票日公布的調查顯示，如果老闆向員工施壓，暗示要他們選擇某組候選人時，有高達八成人表示會拒絕接受。(東森新聞網)

不過，台灣的民主仍有其局限性，那就是：低下階層勞動人民不能推出自己的真正代表去競選，以選出確能替自己爭取權益的總統。這次的候選名單只有兩張：其一是國民黨和親民黨合組的連戰、宋楚瑜(以下稱藍營)，另一是民進黨的陳水扁和呂秀蓮(以下稱綠營)。他們都是代表台灣資產階級，而且各要耗費10億左右的巨額財力物力去競選的(連戰本人便擁有天文數字的財富，極佔優勢)。其他的黨派，像泛紫聯盟、新黨等，財力遠遜於藍綠營，自知無望獲勝，因而不提名單競選；勞工階層的政黨就更少財力去參選了。因此，台灣選舉的民主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代表性十分有限。

而以競選的兩「營」來說，它們的一般政綱並無重大的分歧。過去的主要歧見是：民進黨傾向本土化，國民黨和親民黨傾向與大陸和好統一，倡言要加快三通，以大大幫助發展台灣經濟；但對於北京所主張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連宋們也是堅決表示排拒的，為的是要與陳水扁競相爭取堅持本地化的台灣選民。正因為如此，在此次投票之前幾天，連戰還要進一步說明「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堅持不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吞併、統一」，「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一位權威專家指出，甚至國親兩黨頭面人物也已經說，私下贊成「一邊一國」，即大陸那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這邊是「中華民國」。(3月18日《文匯報》報道)

在競選宣傳中，兩營不是要強調其政綱和施政

立場等有何分歧，而是要互揭對方的瘡疤。例如，藍營力指民進黨收受政治獻金，扁妻炒股票不報或少報收益，但實際上，國民黨也承認有收過獻金，而連戰本人也被揭發在美國有房產沒申報，因而被罰款。

至于此次競選中發生的賄選、暴力及妨害選舉的案件，據投票幾天前的官方統計，島內各地檢查機關受理了2360件，被告人數1579人，其中賄選案件多達1866件。由此可見「黑金政治」仍存在于兩「營」之內。報道此事的新華社台北電，並無指出涉案的是哪個營，或者各佔多少件。

由于上述許多事實已盡人皆知，廣大的台灣民眾都流傳着一種看法，就是把藍綠兩營視為兩個爛蘋果，難以選擇哪一個較為少爛些。這也是民間團體倡議投空白票，以致有33萬張廢票的原因之一。

對於選前爭論多時的大選時「公投」，部份由于北京的非常激烈反對，迫得陳水扁要修改「公投」內容；而許多選民也難免會感受到北京的強大壓力，因而投票率未過半數，不獲通過，這也反映出民進黨沒有得到大多數選民的支持。

選情的變化

陳水扁上台以後，台灣經濟凋零(只在近年來由于對大陸貿易大量出超而稍有好轉)，兩岸關係則無法改善，尤其是北京當局對他採取壓制政策，三通沒有打通，如果他當選連任，與北京的關係也難望有大改善；而藍營的大陸政策，表面看來似沒有那樣對立，有希望得到北京放寬，三通因而可能有所突破，這些特別是台灣資產階級所希望的。因此，資本家較多人寧願支持藍營，讓連、宋替換陳呂。

台灣前幾年的經濟低迷，加上兩大黨的領導人(無論是過去的李登輝、現時的連戰或陳水扁等)都會為了保衛大企業的利益，不重視低下民眾的生活改善，不進行消除社會不平等的改革，反而導致失業人數日增，貧富日益懸殊，社會日益向兩極分化。儘管陳水扁的政綱列有保障中下層權益的條文，但並沒有行動去實現。在這種情況下，中下層民眾對陳水扁政府的不滿便加深，很多人都不願投綠營的票。

以上的情況，使藍營一度聲稱自己已穩贏了。

但在投票前一日，卻突然發生了陳呂被槍擊一事，使陳呂獲得了許多同情票，扭轉了整個形勢，僅以不到3萬票(佔總投票率0.288%)的微弱差距當選連任。台灣選民對這些發展的意見，部份可反映在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和台灣《蘋果日報》的訪問結果中：在選後次日被成功訪問的1174位選民，有50%接受選舉結果，45%相信選務作業是公正的，42%質疑不公。

質疑和紛爭

連戰在這次選舉戰中，眼見「穩贏」後，竟以微小比數，再敗於陳水扁，非常不甘心，立即提出「選舉無效」，認為疑點重重，是不公平的選舉。

國親兩黨再次呼籲支持者上街集會靜坐，要驗傷驗票，要真相。群眾不斷包圍總統府，多日不肯離開，宋楚瑜又聲言會帶領群眾衝進總統府。連宋們這種力圖利用群眾街頭鬥爭，迫使陳呂作重大讓步的做法，使得台灣人民憂慮台灣局勢會日趨動盪，可能失控，並且給中共以此為口實進行軍事干預(事實上，北京不久也發出警告：如果內亂加劇，「中國不會坐視不管」)。因此，早在選後翌日進行的上引民調已經顯示，雖然有49%受訪選民支持連宋提出選舉訴訟，但也有63%反對聚眾抗爭。

對於連戰們對槍擊事件的質疑，應台當局邀請而到台調查的國際知名美國華裔專家李昌鈺和3位美籍專家，經過調查後証實，扁的傷口是槍傷造成的，由此澄清了是否被槍彈射傷的疑問。

至於質疑陳呂是用苦肉計博取同情票取勝，一般人都會不相信陳呂寧願冒此生命大危險，因為槍手是在數碼之外開槍，有可能擊中要害，即使不致迅速斃命，也可能大病一場或終身傷殘。

在雙方商談驗票問題時，連戰曾一度堅持只驗綠營得票，不驗藍營的，驗票費用全部由綠營支付。經過大半個月的討價還價後，直至4月12日，雙方才達成「初步共識」：全面驗票，於5月10日起驗，5月20日完成；費用大致由雙方負擔。如果這樣進行，中途又不發生嚴重爭執而打斷，則驗票結果，將可以解答許多人的質疑。如果驗出綠營得票總數少于藍營，則陳呂倆在法理上就不應連任總統、副總統了。但驗票還要等高院最後核實，正式結果將不能在5.20之前宣佈，而宣佈後紛爭仍會持續不止。

此次大選的紛爭，已引起國民黨內部的不和及

危機：一方面是馬英九在鬥爭方法方式上與連、宋們有歧見，在強力趕走包圍總統府的藍營支持者而發生流血衝突後，馬又受到該營指責；另一方面，黨內新生代中興菁英班部分成員要求國民黨面對敗選事實，另一個團體「567大聯盟」也成立，提出許多方面的改革主張，其中包括：承認兩岸分裂狀態，不主張統一，保留未來的「統獨」選項，等等。此外，要連戰辭去黨主席職的聲音已響起了，看來「連戰皆北」的主席地位也將難長久保持。

美國和北京的反響

美國政府在選舉委員會正式宣佈陳呂當選後，即向陳、呂祝賀，以表示它也加以承認。它對台政策繼續不變：支持台灣政府，向台出售先進武器，維持台海現狀，不願兩岸任何一方加以改變。因此，它屬意陳水扁在5.20就職演詞中重申「四不一沒有」的承諾，而扁演詞稿也已先給白宮審閱。對於台灣06年的「修憲」計劃，美國在台的高級官員葛天豪表示：美國的「支持是有限度的」。這意味，如果修憲的內容溫和，不致引發台海局勢的改變，美國還是支持的。若果如此，在美國支持台灣之下，北京較有可能採取的對策是必要時對台經濟制裁，或者加海上封鎖，而較少可能因扁修憲就軍事進攻台灣。

北京當局吸取了過去在台灣選舉前夕出言干擾的做法，以免客觀上使本土化的黨派得到更多的選票，在這次大選時只着重於海軍登陸及8艘軍艦南下的演習，並且發出如台灣動亂升級「不會坐視不管」的警告。它多年來寧願連、宋上台，也不欲民進黨執政，對這次大選也是如此態度。不過，公開主張與大陸統一的新黨卻沒有市場，勢力一直很少發展。從上面所提到的連、宋也趨向本土化而相應地改變了與大陸統一的主張，可反映台灣民衆不願統一的普遍意向，及對各政黨所造成的壓力。近幾月來，北京當局在香港實行的強硬收緊政策，自行撕毀它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承諾，更加使台灣民衆不相信中共對台灣的許諾，因而進一步加強他們的本土化要求，增加很多人不贊同北京提出的「一國兩制」主張。

在大陸，廣大民衆從新聞媒體聽到或看到的台灣同胞能享有不斷上街遊行集會、表達自己要求的充分自由，享有不受限制地自由地直接選舉台灣最高領導人的民主權利，(下轉第21頁)

「六四」十五週年看新的鬥爭 張開

要求平反六四之聲不絕

10多年來，國內國外無數正義人士和組織都要求平反六四，以民主運動的真名寫入史冊，為無辜死難者清除污穢；特別是以丁子霖為首的「天安門母親」為其受難親人伸冤，不斷上書當局，要中共公開交代，但一直得不到回答。

在15週年紀念日之前不久，退休軍醫蔣彥永致函兩會和黨政領導層，要為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此信在國內外迅速引起熱烈響應和聲援，成為要求平反六四的有力呼聲。他在此文中敘述當晚在醫院搶救傷者，目覩大量平民中了毒氣彈甚至國際法禁用的開花彈而慘死的傷心情景。他譴責這種屠殺無辜人民的嚴重罪行。他憶起在1998年曾與部份同志以一批老共產黨員的名義，致函國家領導人和兩會代表，建議重新評價六四；同時到楊尚昆家給他看該信，並敘述六四當時在醫院的所見。據他在現時信中記述，楊尚昆當時表示，「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經無力去糾正，但將來一定會得到糾正的。」而且，陳雲後來給中顧委常委的信表示，他「是反對六四這樣處理的。」（實際上，楊尚昆在「六四」時是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握有政軍最高權力，應該是六四期間派軍隊去鎮壓的執行司令官。）

要求平反的呼聲，甚至連一向敵對的死硬頭子李鵬也響起來，所不同的，是他想為自己平反，企圖洗脫遺臭萬年的罪名。據3月19日《明報》報道，當時已被人人怒罵為六四屠夫的李鵬，也企圖推卸自己的罪惡責任，他在退休後於去年秋寫成「六四」日記及書稿《關鍵時刻》，在書中推說89年4月22日10萬學生在大會堂外「下跪請願」，要他出來接請願書，他「當時並不知情而非失信沒有露面。」

李鵬在書中表示，他身在大會堂內，並不完全知道廣場上那麼大的風波，也沒有表示過像胡耀邦治喪委員會人士所說的，他會在上午11時45分會見廣場上的學生。李鵬在文中時而明確，時

而隱晦地表示，六四期間一些重要決策並非出於他手，許多重要判斷也非外界一再誤會那樣是他所言。

《亞洲週刊》引述讀過《關鍵時刻》的人士說，李鵬，在書中透露當年中南海高層對如何處置天安門學運存在明確分歧，也有意撇清自己在「六四」事件的主要責任。

其實，李鵬當時的一切作為，已經如實地記在歷史中，他成為千古罪人，已是衆人皆知，不容抵賴。但他今天還要這樣做，顯然是對歷史的最大諷刺。這也清晰地反映出社會上瀰漫着平反89年學運的強烈氣氛和壓力，預示出距離完全平反的時候是縮近了！

中國的人權紀錄

中共對89年民運的鎮壓，尤其是六四的血腥屠殺，是對民主自由人權的殘酷踐踏。長期以來，人權曾被中共視為「禁區」，連人民提都不准提。1991年11月1日，國務院發表《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其中宣稱：實現充分的人權「是長期以來人類追求的理想」，「是中國人民和政府的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但它却以「生存權是中國人民的首要人權」，來淡化其他各種重要權利的必需性。最近，根據中共建議，人大會議已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一句寫入憲法內，儘管這9個字只表示一項原則，並沒有具體的條文闡釋，而且在實際上壓制異議者的事例繼續出現，但此規定仍是重要的，客觀上可幫助中國人民根據憲法這項規定，挑戰和督促當局必須認真貫徹實施它；如果當局和幹部在行動上違反這項原則，則人民可引用來加以指責、揭露、抗爭（像後面談到的實際抗爭例子所表現的）。這可視為人民長期努力爭取得到的成果之一，而在民運第十五週年的前夕寫進憲法，也反映八九民運爭取民主權利的目標並沒有徒勞。

中國國務院最近發表的人權白皮書，譽讚2003年中國在人權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

就。香港《文匯報》報道白皮書列舉了8項人權紀錄數字，却完全没有政治方面，而只是經濟、文化、衛生方面，其中包括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有440萬再就業，各地償付當年拖欠農民工工資240多億元，從04年起逐步降低農業稅，並在5年內取消。即使這些也可算是人權範圍內的事，但在2003年，由於中共的經濟政策等導致的下崗失業，和農村「多餘」勞動力人數等，共有2億5千萬，遠遠高於440萬的再就業人數；農民工工資共被拖欠達1千億元以上；對「三農」的過重稅項已釀成危機，不能再增，而必須實際上減輕。人民蒙受這些苦難根本就不應發生，而原來可避免的。如果資本家在非常殘酷地剝削工人後略為減輕些剝削力度，這能稱讚他是在人權方面的「努力成效」嗎？

美國最近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出議案，舉出許多事例，譴責中國去年的人權狀況倒退，但遭中國反對列入議程，並得到多數票支持，結果美國提案正如以往那樣遭到否決。支持中國的許多國家，其人權紀錄也是很壞的，因而為虎作倀、狼狽為奸，利用聯合國表決機器作掩護。

官方及其宣傳機器完全避談人民應享的政治權利（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人身等自由，實行法律上人人一律平等）。其原因，就在於官方可以任意剝奪人民這些自由，逮捕和囚禁那些行使自由權利的人，例如：對爭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學運及工運領袖、法輪功信眾、要求高度自治的少數民族，等等。北京當局最近又立法把民衆上訪時展示橫額、呼喊口號等列為違法，對自焚自殺者要追究責任，這同時也是為要防止天安門廣場在六四15週年前後的群眾悼念活動等。上海當局也嚴懲上京抗議逼遷的上訪群眾。

公然踐踏人權的新例

廣州市司法部門更以貪污罪判《南方都市報》前主編程益中和前主編喻華峰等人徒刑，此事在國內引起了強烈反響。北京兩個民營研究機構日前針對南都案舉行學術研討會，內地著名的法學及經濟專家學者與會。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江平說，南都案「根本構不成貪污」；北大學院教授陳興良也指出，「編委會有權分配獎金，

這與貪污有本質區別」。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指本案的處理「是給中央政府一個耳光」，他直指「法院愈來愈成為打壓新聞自由的一個工具」；經濟學家茅於軾也說，本案「不僅是冤枉幾個人，而是對全國人大剛修憲保護個人合法財產的反動」。還有多名京城法學專家、經濟學人和名律師也發言、質疑或批評廣州市當局的做法。（見4月10日《明報》）

美國保護記者協會主席庫珀四月九日去信溫家寶，引用北京法律專家的觀點稱，對程益中、喻華峰和《南都》社務委員李民英等人的法律行動，違反了中國憲法中保護私有財產的內容，侵犯了他們的人權。該會譴責濫用法律手段打壓揭露社會真相的新聞記者。該協會亞洲部高級研究員比奇女士指出，程益中等人被捕的真正原因，是《南都》過去一年的報道，惹惱了廣東省的地方領導層，尤其是去年三月，該報率先報道了湖北大學生孫志剛在收容過程中被執法人員毆打致死的案件，去年十二月，該報又首次披露了廣州去年七月後的首宗沙士病例。

司法部門淪為當權者打壓異己工具的事例層出不窮：

學運領袖之一的張銘被無辜判刑，殘酷迫害，是利用司法工具踐踏人權的顯例。張銘在八九年任天安門廣場糾察總指揮，被列為通緝人士之一，被捕後判刑3年；02年9月，國家指他「涉嫌計劃爆炸大樓」，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再拘留他；後改控「職權侵佔罪」，於03年9月判刑7年。這一連串誣告入獄，使他在以後絕食抗議，至今近半年，體重降至23公斤，性命垂危。

作家杜導斌等人只因在網上發表了不同政見的文章，便被拘禁，控以顛覆國家的莫須有罪名入獄。

上海律師鄭恩寵因熱心幫助一大批被官商勾結賤價收地逼遷的居民，揭露周正毅和上海地方當局狼狽為奸的事實，結果被當局加上「向境外組織提供國家機密」的罪名，由法院判處3年徒刑。

群眾利用官方宣告進行抗爭

隨着黨政領導人胡錦濤提出「新三民主義」、「以民為本」、「執政為民」等理念，尤其是在憲法中確立保護私有財產權，寫入「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的原則等等，民間的抗爭便加以利用，為自己的行動增添有力的理據，對抗壓迫者。最新的事例有：北京居民黃根雲在抗拒拆遷時，高舉新憲法一本，把「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這句規定書寫在門口，與百多名聲援的街坊一起迫退了前來拆屋的公安，便是「立竿見影」的成功應用。

北京市密雲縣，在2月23日有160多名民衆圍堵縣政府，要它對3宗強迫拆遷行為負責，民衆在抗爭中祭出兩面旗幟，一是今年三月開始施行的建設部《城市房屋拆遷行政裁決工作規程》，二是剛剛結束的「兩會」期間通過的保護私有財產的新憲法條款。牽頭發起訴訟的業主代表郝佔明還援引溫家寶總理在今年二月的廉政工作講話中，對堅決糾正城鎮拆遷中侵害居民利益問題強調，指責密雲市政府代理開發商拆遷，侵佔經營者利益，「在某種程度上蘊藏着腐敗」。

重慶市渝中區化龍橋數千名居民不滿拆遷安排，3月27日起一連三日上街示威，堵塞主要道路，自由亞洲電台表示，當局出動數百公安驅散示威者，雙方發生零星衝突，至少三名示威者被打傷，包括兩老人。

去年10月27日，山東鄒城市數千民衆，因抗議城市管理隊輾死一名小販，衝破公安的防線，破壞了市政府辦公室的物件。

其他的工人鬥爭有：

12月中，廣州市約200名巴士司機舉行示威，要求返還押金、成立工會、改善薪酬及假期等。

同月底，蘭州市國企煤氣廠千多名職工下崗後未獲妥善安置，廠方因大部份職工交不起水電及取暖費用，強行停水、電、暖氣，激起他們上街請願，在燃氣集團門口聚合集會，使市區交通阻塞。

今年4月初，同一蘭州市有3千多名員工的紡

織廠，因面臨裁員下崗失業的危機，數百名職工連續在廠門外示威，並抗議「上層管理人員與工人之間的待遇懸殊」。

以上只是近幾月內間中看到的港報報道有關群眾不滿行動的少部份事例。對於政府機關和黨官的批評舉報情況，也可見於下列3則報道中：

一是北京市政府在03年11月11日開設「首都之窗」網站，至12月4日便有12萬人次表述對政府部門的意見，主辦單位即把該網站突然關閉，並未解釋原因，也不公佈資料結果。對此，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劉建明說，政府不要因被提意見就覺得很沒面子，如果善於傾聽並改進工作，一定會得到群眾的信任和肯定。

二是電話舉報黨官違法。中共中央早前頒布《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後，中組部即於上月底宣布在全國組織系統開通專用舉報電話，讓群眾可以通過電話熱線舉報黨政幹部的不公行為。河北、山東兩省在熱線開通第一日，即分別接獲161件及210件舉報，其中絕大多數反映村級和鄉鎮幹部施政過程中的違規行為，顯示農村基層幹部在日常直接面對民衆的施政中，存在嚴重的濫權、瀆職問題。

三是一位學者對中央宣傳部的「討伐」：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焦國標最近在網上發表《討伐中宣部》一文，指中宣部動輒以「穩定壓倒一切」為由，限制新聞報道、封殺媒體，不准報道民工欠薪、上訪、疫情，扼殺民衆的知情權。

單舉上列的3則報道，已可反映出民間對黨政官員批評意見的強烈和廣泛，當局在群眾不滿與壓力下被迫試作開放讓步，但「一放即收」，陷於進退兩難。這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存在基本矛盾尖銳對立的結果。

（2004年4月21日）

烏雲不能永遠遮住陽光

全美學自聯

——就蔣彥永醫生要求正名“六·四”告全國同胞書（轉載）

正值全國人大10屆2次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之際，因2003年抗擊薩斯而被國人尊稱為“中國良心”的蔣彥永醫生，其就“6·4”事件致函中共高層的上訴信輾轉至海外，得以發表並廣為傳播，在“6·4”事件15週年即將到來之際，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懷着感佩的心情，鄭重向國人推荐蔣醫生這一“6·4”15年來極具影響力的石破天驚之作。我們期待所有華人，不分海內、海外，為蔣醫生祈禱、予蔣醫生以支持。我們為中華民族擁有蔣彥永醫生這樣的知識份子而自豪。

“6·4”事件，是數十萬中國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出動坦克、裝甲車和機槍，對要求民主、反對腐敗、和平請願而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黎民百姓，在共和國的首都，大開殺戒、實施一場血腥大屠殺。作為生存者，我們目睹“6·3”深夜野戰軍裝甲車沖破民衆阻攔、咆哮着闖進廣場；我們親見“6·4”凌晨在緊鄰新華門的六部口地區，解放軍坦克瘋狂地碾向緩緩撤出廣場的學生隊伍，血肉四濺、青春之軀頓成肉醬……一夜之間，有多少家庭喪失兒、女、妻子、丈夫；有多少家庭支離破碎、家庭成員致傷致殘；有多少學生市民因參與“6·4”被關押、审判；有多少敢於堅持正義的官員、民衆在“6·4”後受清洗、迫害；更為令人髮指的是，在過去15年裡，又有何止成百上千的“6·4”受難者及其家屬，是怎樣被政府歧視、騷擾和打壓，阻擾他們接受人道捐助，迫使他們含辛茹苦、悲情地熬過這五千多個日日夜夜。這片陰霾已在北京上空、在中國大地飄蕩了15年之久。

“6·4”是民族的災難、空前的國殤。全美學自聯譴責政府發言人屢次非人道的謬論：中國經濟有今天的發展，歸功於“6·4”屠殺，從而使社會得以穩定。衆所周知，“6·4”學生和改革派知識份子正是主張政治民主、經濟自由、反對官倒和反對腐敗。“6·4”鎮壓後，政

府為了挽救危機狀態下瀕於崩潰的經濟，才加速經濟開放和經濟自由化的步伐。全美學自聯認為，以學生為主體的“89”民主運動，是中國90年代經濟自由化的催化劑。然而，中共拒絕政治民主化，才造成在過去15年裡，社會矛盾加劇、民怨沸騰。正如蔣彥永醫生指出的，“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穩定”。

“6·4”15週年即將來臨。可能會使中共領導人失望，今年在世界衆多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和台灣，將會有更多的民衆紀念“6·4”、緬懷英靈。即使在中國大陸，15年的高壓和新聞封鎖，億萬中國百姓依然惦記着這一天、這個我們民族歷史上血腥和黑暗的一日。盡管在警察多於遊客的天安門廣場不容易見到花圈、花籃，哀悼的鮮花自會擺放在億萬中國人心靈的聖地，紀念那些為了祖國、為了民族的自由和富強而慘遭殺戮的青春和冤魂。蔣彥永醫生在信中告訴世人，即使“6·4”時高據中國國家主席的楊尚昆、中共元老陳雲等都反對“6·4”鎮壓；而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中共政治局常委胡啟立等更是因為公開反對鎮壓而遭“老人幫”伙同李鵬的廢黜。我們要問，時至今日，中共領導層究竟有幾位仍然在支持15年前的血腥鎮壓？我們要問，兩百萬裝備精良的人民解放軍，又有幾人會以在共和國首都發動的“6·4戰役”格殺成百上千幾乎同齡的學生、市民而稱功自傲？我們要問，在今天普天之下，13億知道真相的國人中還有幾人會繼續相信政府15年來關於“6·4”事件的謊言？

同胞們，我們不會忘記去年，2003年春天，是蔣醫生不顧個人安危，秉持良知和正義，向大眾和國際社會首先披露北京大規模薩斯流行的真相，敦促當局痛下決心，坦誠面對瘟疫，最終取得抗擊薩斯的決定性勝利，無數百姓的生命得以挽救；今天，2004年春天，蔣醫生再一次挺身而出，以祖國和民族利益至上，置榮辱

安危於度外，向中共高層陳情，促其糾正“歷史錯誤”，為“6·4”正名。我們堅信，蔣彥永先生的思考、主張代表了當今絕大多數國人的思考、主張；我們始終認為，89民主運動和“6·4”事件，歷史和人民自有公論，而不論中共前任領袖如何詆毀、扭曲事實、也不論新一代中共領導層如何處置蔣彥永醫生的陳情。我們悲哀的是，15年後的今天，“6·4”冤魂和“6·4”情結始終絮繞着中華大地、糾纏着我國人走向國家現代化和民族真正的復興之路。但是，烏雲終究不能永遠遮住陽光。我們充滿信心，我們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的“89”精神與“6·4”火光，將永生不熄！

全美學自聯總部
華盛頓2004年3月7日
(轉載自《民主通訊》04年3月號)



關於支持民運人士楊建利 牢中絕食的聲明（轉載）

中國民運海外聯席會議澳洲分部

因抗議中國政府非法逾期關押和非法剝奪與家屬通信、單獨會見律師等權利，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著名民運人士楊建利先生近日開始在中共監牢絕食。為此，中國民運海外聯席會議澳洲分部特聲明予以支持。

楊建利先生於2002年初回國考察工人運動。4月，在中國昆明被警察逮捕。2003年8月，中國法院以間諜罪開庭审理，至今沒有宣判，時近兩年。按中共自己的刑事訴訟法，中共有關司法機關已經在逮捕、提起公訴、审理和宣判等各個環節一再執法犯法。即有侵犯楊建利先生各項訴訟權利的問題、又嚴重超過訴訟期限。因此，我們強烈要求中共自己守法，依法辦案、盡速將楊建利先生無罪釋放！

楊建利先生留學美國，先後獲得兩個博士學位。他自願放棄優越、舒適的生活，謀求中國人的自由、民主等福祉，憂國憂民，冒險返國，身陷囹圄，怎不使每一個願我中華興旺發達、國富民強的熱血兒女感慨稱羨！我們再次向中共當政者陳明：楊建利先生等民運人士無罪有功！他們為我中華民族的獻身精神和所作貢獻必將光照千秋！

民主潮流浩浩蕩蕩，民主價值深植人心。勤勞、智慧、善良並曾為人類文明作出過巨大貢獻的中華民族已經遠遠落後於世界各國，歷史給我中華民族的時日已無多。我們呼吁中共當政者，如果你們真的愛國愛民，那就放棄或讓出一些你們的權利和既得利益，盡快在中華大地實行民主憲政，讓我中華民族早日騰飛！如果你們依然堅持專制獨裁，頑固阻碍中國的民主進程，那就必將被滾滾向前的民族大潮所淹沒！

2004年3月7日
(轉載自《民主通訊》04年3月號)

資本主義化帶來的日增惡果

張開

盡力保護私有財產

3月召開的第10屆全國人大第2次會議，遵照中共的意旨和建議，對憲法作出部份修正，以法律條文更加完善地保護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增加「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這樣的新條文，連日本、意大利、西德、印度等10多國的憲法也是沒有的），以此成為憲法的一項原則，表明中共要給予私營資本家一個「定心丸」，使他們放心去獲取私人的財富。同時，憲法增加了私營資本家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的美好定性，刪改了剝削階級這個傳統的科學名稱。這類的修改顯示中共要不遺餘力地推行資本主義，反映出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正接近全面地完成。

與此同時，原來作為非資本主義經濟成份的國有資產，其在全國經濟中的比重、作用和貢獻也在日益減少，日益被資本主義經濟所逐漸取代，變成不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中共現時推行的政策，正在自覺地推進這種趨勢。例如在近日召開的全國國有資產監管工作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黃菊指出，要加快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和國企改革，各級國資監管機構要牢牢樹立出資人意識。國資監管委員會主任李榮融表示，今年要力爭在國企股份制改革方面邁出較大步伐，除軍工生產等少數企業外，其他國有大型企業包括特大型國有企業，要以調整和優化產權結構為重點，通過規範上市、中外合資、相互參股、兼併收購等多種途徑進行股份制改革。這即是要把大型的國企也讓資本主義力量加入，使它們部分地私有化。

親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厲以寧指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為國有資產的重組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民間資本的介入實際上意味着這種混合經濟的形式正在發展，這也是公有制的新形式。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張卓元在政協全會發言時表示，目前國有經濟佈點過多，領域過寬，今後需要保留國有經濟控制的應主要集中在中央管的100多家大型企業，國有資本應逐步從一般競

爭性行業退出。即使國有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從目前的30%左右逐步降到20%左右，仍然能主導國民經濟的發展，其地位和比重仍然大大高於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佔5%左右）和發展中國家（佔10%左右）。

〈1〉

上述的研究員實際上已把中國列為資本主義國家，否定中共之偽稱它為「社會主義」的稱號和定性了，但他的大減國企比重的主張，也是反映親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不利於真正的社會主義發展的。與國企比重的消滅相反的是，民營企業在社會發展貢獻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佔了全國稅收的43%，以及接納下崗再就業人員的65%，在市場經濟中是積極的力量。〈2〉

私營企業勢力的加速發展，由於國務院在兩會召開前夕，即2月1日，發佈了一項指令而如虎添翼，該項指令提出：要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各部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政策，為資本市場穩定發展營造良好環境。（當前的）任務是：以擴大直接融資、完善現代市場體系、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為目標，建設透明高效、結構合理、機制健全、功能完善、運作安全的資本市場。要採取切實措施，為投資者提供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增加財富的機會。要培養一批專業的機構投資者，使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險公司為主的機構投資者成為資本市場的主導力量。

〈3〉

造成的惡果日增

主要由於中國的資本主義化所必然帶來的惡果，廣大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大量的工人下崗失業，社會向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投資及生產無計劃性等，都在日益增多地湧現。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向這次人大作的0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和04年計劃草案的報告，便有如下的承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還存在

許多不容忽視的困難和問題。不但多年積累的一些深層次矛盾還沒有解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依然存在，而且經濟運行中又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一是農民增收困難，糧食減產較多。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比上年低0.5個百分點。濫佔耕地現象比較嚴重，糧食總產量比上年減少264億公斤。二是就業矛盾突出。目前城鎮下崗和失業人員仍有1400萬人左右，預計今年新增城鎮勞動力1000萬人左右，還有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需要轉移。三是部份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城鄉不少低收入居民生活還比較困難。四是經濟結構不合理和增長方式粗放的問題依然存在。部份行業和地區盲目投資、低水平重複建設有所加劇，消耗高、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狀況比較嚴重，煤、電、油、運供求關係緊張，資源約束的矛盾日益突出。五是經濟與社會發展仍不協調。公共衛生服務體系不健全，農村教育整體薄弱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改變。六是市場經濟秩序仍較混亂，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急需加強，重大安全生產事故時有發生。

以上所引的雖比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有些敘述稍為具體些，但仍是避重就輕、語焉不詳的。因此，需要根據新披露的具體資料和事實，進一步分別加以指出。

「三農問題」

上述的第一個問題，也就是「三農問題」，尤其是其中的農民問題，是異常嚴重的。由於農民長期以來負擔過重，而農產品價格又很低，使得農民收入增幅逐年下降。即使照官方數字顯示，1996年是9%，2002年只有4.6%，而且，這些增幅還是農民外出打工和非農經營收入創造的；胡溫主政的2003年是4.3%。這導致農民的生活難以有大改善，儘管在25年間，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24億元人民幣增至2003年的116,694億元；人均GDP從379元增長到8469元。

城市擴張，建築用地大增，侵佔了農民的土地，又不給予農民合理的補償，不對失地農民作適當的安置。據官方雜誌《中國土地》估計，近20年內，各地政府向農民徵用土地約1億畝，扣除農民的補償，巧取豪奪農民的土地資產達2萬億元以上。〈4〉

《人民日報》2月2日一篇題為《失去土地的農民如何生活》的文章指出，目前，全國失地農民總數估計在4000萬人左右，每年還要新增200多萬人。「造成農民失地失業的真正原因不是城鎮化進程加快，而是現行徵地制度。徵地補償理論和制度設計上的缺陷，導致失地農民問題日益突出。」「在目前的徵地制度下，農民喪失了雙重權利：土地賣與不賣，不由農民決定；即使農民要賣地，也沒有與買方平等談判價格的權利。」

這樣，不但造成有接近1億農民到城鎮找工作，而且有1.3億農村剩餘勞動力處於失業狀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3月9日在記者會上說的）。民工到城鎮找工，並不是容易找到的。四川一名民工在成都市找不到工作，盤川又用盡，因餓極狂抓泥沙吞下，後昏倒在地上。〈5〉這可見農民工的苦況和無助的一角。

而農民工到城市即使有了工作，却被任意剝削和拖欠工資。據報道各地拖欠民工工資的現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據估計，目前全國拖欠民工的工資約在1,000億元左右。〈6〉據鄭斯林介紹，自去年起至今年2月，政府已為農民工追回250多億元拖欠工資。鄭斯林表示，政府將清理城市就業中歧視農民工的有關地方條例，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查處侵害農民工權利的企業法人和個人。〈7〉

此外，農民的政治權利也長期被侵奪，被歧視，成為「城鄉有別」特點之一。據北大學者龔刃韜表示，中國的農民已經淪為二等公民。他以正在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為例指出，在九億農民的農業大國的2900多名人大代表中，有農業戶口的代表只有56人，佔總數百分之一點九。他批評說，「世界上在選舉法上公開歧視農民的國家就數中國」。

農民除了在社會活動中的參與程度極低，還缺乏城市人的最低生活保障。龔刃韜指出，3394萬畝的非農業徵地，農民沒有農會，到城市做工也加入不了工會。〈8〉

另一方面，農村耕地面積却已逐年減少。國土資源部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單是在03年，就由02年的18.89億畝，下降到18.5億畝，一年的減幅便達2%。

加上耕種的農民數量減少，他們的種糧積極性又減低，便直接造成糧食產量連續多年大減。據「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此次政協大會發言時表示，由於生產銳減，每年形成0.25億噸至0.35億噸的缺口，去年的缺口更高達0.5億噸。糧食供求關係日趨緊張。1998年，內地糧食總產量達到了5.12億噸的歷史最高水平，之後，連續5年下降，2003年已跌到4.31億噸；糧食年人均佔有量從1996年的414公斤下降到2003年的333公斤（5年間下跌15.8%，人均佔有量下降了2成。）〈9〉

三農問題的嚴重，自從幾年前湖北「村官」李昌平很中肯地總結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之後，又有陳桂棣、春桃夫婦在03年12月發表了《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具體詳實地披露了他們費兩年時間採訪安徽各縣所見的農民極為悲慘情況。該文發表後，立即引起社會上很大的震撼，了解了「想像不到的」農民所受的痛苦，遭到村幹部的打壓和橫徵暴斂的重負等實況。這些情況，是朱鎔基主政時把三農問題作為經濟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今天在胡溫領導下，更升為全部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的原因之一。

三農問題既然非常嚴重，就必須切實加以解決，而不是像以前空喊的「要減輕農民的沉重負擔」，因此，中共中央直到兩會期間才宣佈，要在5年內取消農業稅（今年起則先取消特種農產稅，這項稅每年可減輕農民負擔48億元，農業稅則在03年收取了338億元。）

失業，再就業和社會保障

中國推行經濟改革，走向資本主義化，產生越來越多的失業。據上引的鄭斯林表示：今年新增就業人口2400萬，今年安排就業900萬，但不包括從農業轉出來從事二產、三產或進城務工的接近1億人，加上農業生產還有約1.5億富餘勞動力，因而農村需要分流安排到二、三產業人數是2.5億。這顯示：

1. 下崗失業人數比去年春所說的1180萬人增加了220萬，官方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7%，再比上年末的4.3%繼續增加。

2. 今年即使能克服很大的困難，安排了900萬人就業，仍有1500萬人未能就業；
3. 現時需要安排農村多餘勞動力2億5千萬人，數字非常驚人，比之不久前說的增加了2千萬人；
4. 去年春，勞動和社會勞動部長張左己已經宣稱：「當前就業形勢非常嚴峻」，而今年需要就業的人數更多很多，形勢更嚴峻得很，便可想而知了。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嚴浩在最新一期《瞭望》周刊上撰文指出，「十一五」時期中國城鎮地區至少存在3000萬個就業缺口，某一時期城鎮失業率最高可達10%。

這種非常嚴峻形勢，在中國社會調查所的民意調查結果中，也可反映出來：它在兩會期間回收全國十大主要城市1500份的問卷顯示，市民最關注的焦點問題首當其衝是就業和再就業問題，公眾的關注度佔98.8%。（其次是希望解決社會保障的關注度佔96.1%，對腐敗問題的關注度佔94.1%。）〈10〉

對於沒有就業的城鎮人口，以及農村的失去土地和「多餘勞動力」的農民，他們的生活都會發生問題。如果國家不加以適當處理，給予援助，就很可能大大增加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威脅到中共的統治。因此，在做好就業和再就業工作之外，還要有社會保障的措施，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在經濟改革以前，國營企業的工人可享有各種福利，生活、醫療等都得到解決；但其後，「關、停、併、轉」的國企多，過去的福利便要由新的企業或機構來接手，社會和職工也各要負擔部份的醫療保險等供款。鄭斯林指出：由於中國建立社會保障的時間短，國家人口多，過去又沒有積累，因此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難。以養老保險為例，現在離職退休老人年輕時是在計劃經濟下工作，他們沒有積累，但是現在每個月必需要發給他們養老金，不然他們連生活都成問題，因此造成資金很大的缺口。去年，中央財政在養老保險這一項就補貼了474億元。而要建立一個能夠正常運轉的機制，還需要若干年的時間。勞保部下一步將把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從原來的公有制經濟擴大到各種所有制經濟，同時將提高社保基金的繳費率，現在有一部份企業由於種種原因還沒有繳費，要督促它來繳。

此外，為了賺取更多的資本主義利潤，企業主都不顧工人的健康和工業安全生產；同時不顧消費者的健康和生命，制造各種假偽劣質的物品出售。這些情況正日益湧現於中國各地。

貧富日益懸殊

中國的日益資本主義化，其惡果之一，是社會日趨兩極分化、貧富懸殊。這一方面是在城鎮居民之間。據全國政協委員蕭灼基說：「2003年中國堅尼系數已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中國城鎮居民擁有的金融資產中，佔城鎮居民20%的富有居民佔到66%，而20%低收入居民只佔1.3%，相差50倍以上。」〈11〉另一方面，是在城與鄉之間的收入懸殊。據中國政法大學學者蔡定劍的學術調查報告顯示，目前中國城市人均收入高於農村五至六倍，其貧富差距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高的。〈12〉

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分別在1988年、1995年和2002年，展開3次全國範圍的住戶調查，並於最近完成調查報告。報告顯示，自1997年以來，農民的收入已連續7年低速增長。調查負責人之一的李實也指出：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13〉

在資本主義經濟更加發展的深圳，貧富差距更高很多。《南方日報》引述抽樣調查資料顯示，去年深圳市居民各佔10%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75,657.60元和5212.32元，高低相差13.5倍；而前年的最高收入戶和最低收入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8,428.80元和6662.04元，高低相差9.2倍。兩年相比，高低收入差距繼續擴大。此外，去年200戶家庭平均人口3.38人，比前年增1.8%，每戶就業人數1.8人，比前年減少3.2%。這意味就業成員和家庭收入都在減少。

如果將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與西部中部貧瘠落後地區的人民收入相比較，其懸殊差距就更大得很了，後者的人均月收入只有幾十元。

鄭斯林力圖淡化全國範圍內普遍存在的社會成員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巨大差距事實，只說是「部分社會成員」之間的局部問題，這是中國官

方遮掩真相的慣用說法。

河水污染、生態環境遭破壞

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勢必加劇河流水質污染的日益嚴重，生態環境的破壞。這是因為工業生產造成的污水，許多都不經過處理，便排放入河；城市人口集中，又使生活污水大量排放入河。以下只引述近來報道的幾例，便可見情況的嚴重。

（一）有中華民族「母親河」之稱的黃河，近年中下游幾乎所有支流水質常年處於「劣5類」（水質分1至5類，劣5類即比最差的第5類還惡劣）狀態，支流變成「排污溝」。三門峽水樞紐管理局副局長劉紅賓說，90年代後期以來，每到冬春季節，三門峽水庫的泄水都會因污染變成「醬油水」。黃河流域每年因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115億至156億元人民幣。

黃河肩負沿岸地區逾50個大中城市和420個縣的居民生活供水任務，河水污染給城鎮居民供水安全帶來巨大威脅。

尚曉成表示，2003年，黃河發生有紀錄以來最嚴重的污染，三門峽水庫蓄水變成「一庫污水」，國家緊急啟動的第7次「引黃濟津」（引黃河水入天津）被迫停止。

日趨嚴重的污染破壞了黃河生態系統，河道中近三分之一的水生物絕迹。黃河水利委員會負責人說，初步估計到2010年，全流域年均廢污水排放量將逾65億立方米。如不採取治理措施，黃河幹支流大中城市所在的河段水質可能全部劣於5類水質標準。〈14〉

（二）渤海流域包括天津、河北、遼寧、山東的13個沿海城市，水域23萬平方公里。據光明日報12月13日消息：近20年，環渤海地區的經濟得到了飛躍發展，但同時卻忽視了對生存環境的保護。有關專家呼籲：如果再不採取果斷措施有效遏制污染，十年後，渤海將變成第2個「死海」。

2002年《中國海洋環境質量公報》顯示，渤海未達到清潔海域水質標準的佔總面積的41.3%，03年僅為24.6%。海洋檢測專家說，等渤海成為「死海」時，即使不再向渤海排進一滴污水，單靠其自然與外界交換恢復生態，至少要用2百年時間。〈15〉

(三)與香港一線之隔的深圳，由於城市擴張，水污染情況日趨嚴重，每天有50萬噸生活污水排入河，市內11條河流中的七成即8條河受到嚴重污染，主要飲用水源地也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包括與本港共享的東江水系河流，約80%河段水質屬「超5類」（即不能飲用）標準，全市44個水廠有一半原水質受到污染。〈16〉

(四)在華中、華東的長江，高峽出平湖，庫區內氣候的改變、水質的污染、動植物種的變異等等都相繼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三峽兩岸的生命進入生存的無常狀態。

中科院武漢水生所研究員蔡慶華對《瞭望東方》說，三峽水庫水體的污染狀況仍比較嚴重。

最近，長江流域水生物的優勢種、非優勢種種類數目有所減少，非常見種和罕見種就幾乎很少出現了。〈17〉這是對生態環境很大破壞的另一例証。

無計劃性投資和生產

資本主義經濟的加速發展，加劇了投資和生產的無政府、無計劃性，這是資本主義的固有特點之一，並且必然帶來許多嚴重惡果。《人民日報》2月24日的《政論》版刊登了陳佳貴的《抑制局部經濟過熱的苗頭》一文，便作了如下的指出：

2003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到55118億元【即佔了03年國內生產總值11669億元的47%——引者】，增長26.7%，增速比上年加快9.8個百分點，其中基本建設投資增長28.7%，加快12.3個百分點。在建項目的固定資產規模為16萬億元左右【即接近3年的工作量——引者。】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許多深層次問題，如結構不合理、粗放經營、舊體制的束縛尚未解決，經濟運行中又出現許多新情況，其中不少是由於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引發的。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共有各類開發區3837個（有的資料說有5000多個），其中省級以下未按規定程序批准的，占開發區總數的67.4%。為了追求經濟增長速度，一些地方不顧當地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新上了一批高耗水、高耗能、污染嚴重的項目。這些項目大多是通過銀行貸款建設的，有些項目根本就沒

有資金保障，或者資金缺口很大，只能採取低價強行征購農耕地、拖欠施工單位的資金和農民工資等辦法支撐。

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給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一是）造成能源、交通、主要原材料供應全面緊張。（二是）加劇了一些行業的盲目擴張和重複建設。受高速增長的投資需求特別是基建投資需求的拉動，鋼材、水泥、電解鋁等行業盲目擴張和重複建設的現象加劇。（三是）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構成極大衝擊。盲目投資、重複建設造成低水平重複，浪費資金、浪費資源，將進一步惡化產業組織結構和產品結構，從長期看將影響經濟效率的提高。（四是）增大了通貨膨脹和金融風險的壓力。由於投資需求的拉動，主要生產資料價格全面上漲。

在陳佳貴及官方指03年存在問題之後，04年首季仍沒有減速迹象，1月至2月份，城鎮50萬元以上項目完成固定資產投資3287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53%，創10年來新高。

另一方面，投資的收益卻逐年下降，到去年開始更低至不足4%，比超過5%的銀行借貸利率還要低；投資收益彌補不了資本成本，擴大投資只會增加虧損及浪費，並且令銀行壞賬不斷上升。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表示，中國目前的局部經濟過熱傾向，實際是中國現行體制引發的，是地方政府過分參與經濟事務、貪大求快導致的結果。〈18〉但地方政府這樣做，又是由於中央推行資本主義，帶來利潤掛帥的刺激；幹部追求「政績工程」，而且脫離群眾監督等原因所致。

錢權結合加劇貪污腐敗

改革25年來，金錢與權力相結合，使中共所稱的「反腐」越反越腐敗，使中國越來越進入腐敗的高發期。貪污腐敗的嚴重，部份反映在去年檢察機關的立案數字上：最高人民檢察長賈春旺3月10日在高檢工作報告中指出，全年共立案偵查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犯罪大案18515件，其中涉案金額1000萬元以上的123件。立案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2728人，其中地廳級幹部167人、省部級幹部4人。

這些數字只是上層領導為紓緩民憤而以他們來「祭旗」示衆的，實際上幾乎是俗語說的「無官不貪」。新華網根據調查刊文報道的安徽蕪湖市「亦官亦商」的事例便可見一斑。該文宣稱：雖然中央規定，黨政幹部不得在企業兼職，但新華網調查，蕪湖市政府主要官員，幾乎全都是「紅頂」商人。市屬四區三縣均有自己的建設投資公司，由區長和縣長兼任董事長。甚至一些鎮政府、村委會，都經營公司來牟利。據了解，省委組織部曾多次下令清查，仍無法禁止蕪湖市「官商一體」的現象。一名普通幹部說：「我們都知道中央關於黨政幹部不得在企業兼職的規定，市領導怎麼能不知道！只不過，『紅頂商人』集權力和財力於一身，一手制訂政策，一手利用政策賺錢，可以給個人帶來利益空間實在太大了！」〈19〉

對於貪污腐敗的情勢發展，清華大學廉政研究室主任程文浩副教授指出：腐敗有4大趨勢：1、群體化特徵；2、行賄受賄手法越來越隱蔽；3、智能化、技術化；4、國際化。〈20〉

關於中國現有改革所造成的社會分化，社科院最近訪問了政、經、法等多個領域的109位專家。其中有40.4%專家確認存在部份的隱患因素，有34.9%認為部份民衆（存有）利益損失感；有73.4%認為黨政官員群體被看成為現有改革中受益最多的人群，只有0.9%（即只有一位）被訪者認為，是傳統的體力工人和農民受益，「這樣分佈顯示出社會分化的基本趨勢。」〈21〉（這也反映出絕大多數被訪問的專家都會認為，現行的改革對工農大眾是有損無利的。）

由此又一次表明，黨政官員侵奪了工農創造的財富，加劇了社會的分化，使統治的官僚與人民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化。

2004年4月20日

註釋：

- 〈1〉 3月8日《文滙報》。
- 〈2〉 3月11日《文滙報》。
- 〈3〉 2月2日《明報》。
- 〈4〉 3月2日《明報》轉引。
- 〈5〉 2月20日《蘋果日報》轉引四川《天府早報》報道。
- 〈6〉 1月13日《文滙報》。
- 〈7〉 3月10日《文滙報》。
- 〈8〉 3月9日《星島日報》。
- 〈9〉 3月4日《文滙報》。
- 〈10〉 同上報。
- 〈11〉 3月10日《文滙報》載新華社電。
- 〈12〉 3月8日《文滙報》。
- 〈13〉 2月26日《經濟日報》。
- 〈14〉 4月3日《明報》。
- 〈15〉 03年12月14日《文滙報》。
- 〈16〉 2月20日《明報》。
- 〈17〉 12月24日《文滙報》。
- 〈18〉 4月16日《明報》。
- 〈19〉 2月24日《蘋果日報》轉載《新華網》。
- 〈20〉 3月11日《文滙報》。
- 〈21〉 請參看2月24日《文滙報》。



北京見聞

楊萍

到北京的第一個印象是人太多，地方太大。為了迎接2008年舉辦的奧運會，北京正在加緊建設，外來民工就超過百萬。據說今年冬天特別冷，年關在即，外來民工為了討工錢回鄉過年與工頭鬧糾紛的事件，和建築行業包工頭（有分為一包、二包、三包，以至於五、六包等）與農民工之間扯皮現象層出不窮；吃虧討不到工錢仍是來自農村、文化層次低、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傳媒刊載的溫家寶總理為農民工討工錢的事傳為年終佳話。而在這佳話背後，不知隱藏多少辛酸和血淚。為什麼一個國家總理要為農民工討工錢？這是因為中國有兩億多農民工，發跡的資本家、承包商、工頭拖欠農民工的工資總數估計每年就有一千多億元。加上剝削價值就不可勝數了。這個矛盾的深化和積累，迫使新上台的領導班子不得不正視這個嚴重的階級矛盾。否則就有“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危險。

據《作家文摘》轉載《瞭望東方周刊》（2003年第4期）文章《2003年中國的信訪洪峰》所載：“…據一份權威官方資料，僅從2003年7月1日到8月20日，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到北京市委上訪的人員達一萬多人次，群體上訪的就有1.9萬人次，集體上訪達347批；到中紀委上訪的人員達1萬多人次，群體上訪463批，平均每天達100多人，最多的一天達152人，創開放改革以來新高。”

國家信訪局局長周占順11月在接受新華社《半月談》採訪時公開承認：“今年以來群眾信訪總量仍呈現上升趨勢。”周占順特別指出近期以來，群眾集體訪，重複訪和群眾赴京上升幅度大，人數多，規模大，持續時間長，行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業引起連鎖反應，嚴重影響北京和局部地區社會不穩定。

最嚴重最典型的莫過於浙江省縉雲縣新碧鎮對於農民土地的征用風波了。今年初，縉雲縣政府一紙令下，新碧鎮的4000畝良田被征用為工業開發區用地。在村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各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在兩天裡陸續簽了字，村民們的抗爭則隨之

而來。在村民們兩次進京上訪，取得國土資源部等要求取消征地令的批示後，當地征地行為不僅沒有停止，反而加緊推行。11月24日，來自幾個村的1000多名村民與600多名武警、聯防隊員、民兵和幹部發生衝突。30多名村民被打傷。但警方受傷的人員更多。之後，農民方衛強被按上“聚眾鬧事”的罪名遭到搜捕，他逃到北京繼續上訪。

“周占順認為多數上訪是有理的。”

今年4—7月間，中央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指出，政府今後的一個中心工作就是及時化解社會矛盾，依法解決好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和訴求。在實踐中體現執政為民，維護社會穩定。

國情諮詢專家胡鞍鋼等人在1999年就發出嚴重警告稱：中國將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時期，其突出表現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上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

來自官方的數據還表明，近幾年中國城鎮的居民正出現“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現象。調查顯示：城鎮居民對自身狀況不滿的人數在22%及45%之間，其中非常不滿者佔7%—8%，大約在3200—3600萬人之間。

全國人大常委辦公廳一位信訪局副局長認為：“目前愈來愈多的上訪案件，…信訪部門的有限權力…根本無法解決今天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

三月間10屆二次人大會議提出修改憲法，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可見由“合法”的私有財產引發的社會問題已經達到非要通過修憲的手段來解決不可了。這當中即包括城市的失業問題，也包括農村的所謂“三農”問題。

永遠懷念周仁生戰士(1922—2004)

十月評論社同人



周仁生(又名任辛)老戰友於本月27日非常不幸地永遠離開這個世界了！我們懷著極為悲痛、惋惜的心情，悼念這位品德崇高、為理想奮鬥終身的革命家！

他在很年青的中學時期，接受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主義，從1941年起便開始參加工作，隨後擔任教師，向學生散播政治影響，吸收其中部分青年加入革命行列。1947年到台灣活動，他的同鄉同志的地下組織遭當局破獲，用周阿寶名字的他被通緝，幸而聞風逃離台灣，重回大陸，到上海教書，同時從事政治宣傳工作。

1952年12月冬至那天，他同全國各地的托派同志及其部份家屬、以至同情者，都被中共政權逮捕，他被判無期徒刑，在獄中折磨了20年，後轉為變相地監禁的勞動改造，至1979年釋放回家，就如此喪失了人生最寶貴有為的27年時光。縱使在回家後一段長時期，他也是受監管、奪去政治活動自由

的。從以上的簡要介紹，可見他大半生都處於遭受政治壓迫之中。

為了從事革命工作，他幾乎一生都過著清苦貧困的生活。即使在教書時收入較多些，他也把其中一部分用於支持工作或幫助別人(雖然他是家庭中的主要經濟支柱)。後期的英語教學，更大都是義務性的。這些都表現出他的忘我為人的精神。

仁生在20多年來憑著個人的不倦努力，逐漸成了有名的翻譯家，當地社會上和商業上的文件都要找他翻譯，他自己近幾年來更致力於譯出許多重要的著作，例如：托洛茨基文集的兩大卷《補篇》、多伊徹著《先知三部曲》中的兩卷(後來與人合作，只採用了他的第一卷譯本)、彭述之《回憶錄》(法文版)的第一卷；以及其他許多文章。

本刊曾刊出他翻譯的大量國際問題譯論文章，以蕭明、黃申、周辛等筆名刊出。讀者可以從他這麼大量的譯作中，看出他的翻譯和文化水平的高度、政治修養和理解力、表達力的造詣。他到染病後期還倚在病榻上趕著翻譯稿件，儘管他已經「左腦乏力很辛苦」。他更是一位忠誠的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者，表示熱望能夠盡可能活下去，看到世界的進步變化。

由於仁生的忘我地「任勞任辛地」地勤奮工作，加上一向生活清苦、缺乏調理營養、年邁體弱等原因，患上多種疾病，最後終於被奪去了生命。

仁生戰友的逝世，是革命運動和社會文化事業的難以補償損失。他所留下的譯作、所昭示出來的優秀本質和風範，則是寶貴的遺產，值得加以學習的。

2004年1月31日

周仁生同志傳略

(沈雲芳、周履鏘恭撰)

周仁生同志，浙江溫州人，生於1922年4月22日。溫州中學畢業後，就讀浙江大學外文系。1944年起在浙東三臨中、溫州師範等校任教。抗戰勝利後到上海，以教書為職業，主要從事革命宣傳工作。

1948年參加托派多數派的建黨大會。那次大會托派多數派正式定名為中國革命共產黨，會後周仁生負責宣傳工作。1948年下半年，到福建中學任教，後任校長。那時開始，改名周任辛，後來一直用此姓名。

周仁生同志的革命理論、寫作、外文翻譯、宣傳鼓動能力都很強，曾用托洛茨基思想影響了大批青年。1952年全國大肅托時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先後被關押在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監獄。

1972年9月28日，關押在上海獄中尚未釋放的十二名托派全部被釋放，但當宣佈釋放後，隨即將釋放證收回去，被送到青浦青東農場和周浦玻璃廠兩處勞改單位，各人分住一間事先準備好的居室，每月發給不菲的生活費，但六個人單獨一個院落，不與外人接觸。事實上等於由關押獄中改為管制。

1979年6月5日，法院又把十二人集中到青東農場，公安局裁定恢復公民權。6月底，其中的鄭超麟、喻守一、蔣振東等八人被送到上海居住，周仁生和王國龍等人則回到家鄉。從1952年至1979年，周仁生等被關押了27年。之後的生活，名義上有公民權，實際上有時也受到“特殊的關照。”

周仁生從1979年7月初回到溫州，到04年1月27日逝世，一直從事外語教學和翻譯工作，其中有很大影響的譯作是伊薩克多伊徹的《先知三部曲》，這套由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三卷集，出版後曾經贏得1999年全國十大好書的第七位。他在譯完《彭述之回憶錄》第一卷的大部分後，很可惜未能親眼看到自己大量譯作的出版便病逝了。

周仁生在溫州從事英語教學(許多都是不收報酬的)，培養了不少傑出人材，以其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教學水平，深得大批學生乃至當地社會人士的尊敬。

仁生同志的逝世，是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安息吧！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周仁生同志！

(上接第七頁)

這些表現都會幫助他們產生與大陸情況有強烈對比的觀感，使更多人增加對民主自由的追求。

民主征途任重道遠

儘管這次大選引發了許多的爭執糾紛、擾攘，和藍綠兩營的尖銳對抗，尤其是連戰的非常強硬態度、要求和街頭鬥爭，使人們看到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點，然而，整個大選前後過程所表現出的民衆全情投入，積極參與，不受約束地自由表達己見和行動，各方都要尊重法院根據法律所作出的裁決，等等，証明這種有限度的資產階級民主依然是進步性遠大于倒退，優點遠多于缺點的，這種選舉也是其他許多地區、國家所未有，而必需人民努力去爭取的，正如台灣人民要經過長期的艱苦努力才爭取得到一樣。

反觀對岸的大陸，雖然在半個多世紀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已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全國解放，人民「當家作主」，但直至今日，人民還不能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權利，更談不上真正當家作主了。他們至今仍無權直接選出中央以至省縣級的領導人，雖然有鄉村的基層選舉權，但卻是在地方幹部的「領導」(實即約束控制)之下進行投票，連這樣很低層的選舉也是不能完全自由的。因此，台灣這次的選舉，將會激勵大陸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意志。

雖然中國最高領導人一年前宣稱要「以民為本」(但不是「以民為主」)、「新三民主義」，但中共指揮下的人大常委會最近又非常專制地剝奪了香港人民所應享有的民主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全體議員的自由權利。而總理溫家寶在回應台灣總統選舉的記者詢問時又說，「中國太大，人口太多，發展又不平衡，高層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還不具備。」這其實只是推搪的藉口。中國的隣國印度不也是地大人多和發展很不平衡嗎？但印度人民直選高層領導人早已實行了。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如印尼、菲律賓等)也已陸續實行，西方發達國家更是長期如此行之有效，成為民主政治的標誌之一。這許多事實都証明中國領導人的上引說法站不住腳，並不「開明」。這樣的中國政治，又怎能吸引台灣人民樂意與大陸統一，歸屬北京的中央管治？

2004年4月26日

日本最高法院判決 政府犯法為合法

松本龍雄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日本最高法院開庭公審知花昌一等八名反戰人士提出的“美軍占地特別措施法違憲訴訟”。知花等人在沖繩縣讀穀村的美軍楚邊通訊所裏擁有部分土地。這一天，最高法院的五名法官一致判決違反憲法的“美軍占地特別措施法”為合法。

沖繩的美軍基地是用刺刀把住民趕走後建立起來的，這與舊軍國主義天皇制支配下的作法一樣。但是，當一九七二年沖繩從美軍佔領下“回歸”日本後，日本的憲法保護民間土地不得被強制徵用，美軍基地存續的法律就成為日本政府與民衆鬥爭的焦點。日本政府慌忙趕制了一個五年期限的“沖繩公用地暫定使用法”，平息要求歸還土地的住民的憤怒。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又制定一個“沖繩地籍明確化特別措施法”再延長五年對土地的強制佔用。當時，日本國會內反對黨堅決抵抗，延遲了法案的通過，出現了四天的無法佔領狀態，一些土地擁有者沖入美軍基地，拉起鐵絲和看板不讓美軍入內，同時還開始耕種土地。以後，當此法到期後，日本政府又通過法案，再延長違反憲法的“特別措施法”繼續佔領土地。

一九九六年四月，基於“特別措施法”，在讀穀村的美軍楚邊通訊所失去對土地佔領的權利，土地主人知花要求歸還土地，但日本政府防衛設施局蠻橫地拒絕道：“即使使用權利消失，也不能說繼續利用是非法”。

這樣，在日本政府非法佔領389天之後，又重新通過一個“特別措施法”，使“暫時使用”又合法化。此“特別措施法”原來要求沖繩知事（縣長）代表政府徵用土地（再租借給美軍），當美軍士兵強姦日本少女引發全沖繩反基地鬥爭高漲，大田知事拒絕簽字徵用時，日本政府又改變“特別措施法”，讓日本首相可以簽字決定徵用。

此次知花昌一等人的訴訟，一方面要求賠償被非法強制徵用的損失，同時提訴“特別措施法”本身對憲法第二十九條（保護財產權）及第三十一條（保護法律程式）的構成侵犯。但這次最高法院雖然在加上藉口後承認“雖然有履行與美國條約的義務的高度必要性和公共性，沒有法令根據而侵犯國民權利總是

違法的”，卻以“賠償請求權已經消失”為由拒絕原告的要求。更不能容忍的是，最高法院把與美國的條約置於憲法之上，“承認國家的暫時使用，是履行日美安保條約的必須，有合理性，不構成對憲法財產權保護條款的侵害。至於對美軍提供用地是否合適，是首相的政策性、技術性裁量範圍。”這實際上把政府的犯罪合法化。

在當前的日本政治邁向軍國主義的轉變中，最高法院的此次判決，加速了日本向“國民總動員”法制的改惡，為明年一月的國會通過“國民法案”鋪路，從法律上確立日本國家可以從事將來的戰爭。

（趙京譯自新時代社《橋樑》週刊2003年12月8日第1808號）
2004年4月28日

強烈抗議立川員警署與 東京警視廳壓制言論自由

趙京譯

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立川員警署與東京警視廳以“非法入侵住宅”為由，逮捕了三名向自衛隊基地的住宅區郵箱內散發反戰傳單的市民，並對他們的辦公室和住宅進行搜查，沒收了書刊、電腦等。

三月三日，五十一名在日本的大學從事法律教學的學者聯合發表聲明，強烈抗議員警對言論自由的壓制。他們指出：

一、郵箱內散發傳單，並不構成刑法一三〇條“入侵住宅”罪。郵箱與大門內的住宅不同，是外部與私有住宅的聯繫空間，從來沒有聽說因為有人向郵箱投入廣告而被逮捕的例子。

二、員警採取的手段，意圖是要切斷自衛隊士兵與市民的接觸，這違反了憲法第二十一條保障的言論自由。其實，自衛隊派兵伊拉克，本來就有違憲的嫌疑，對此感到憂慮的市民通過郵箱這一交流途徑與自衛隊士兵交換意見、交換情報，是很普通的方式，無論如何不會構成“入侵住宅”的刑事犯罪。

三、對於沒有犯罪的市民的辦公室和住宅進行搜查、沒收，才是真正的“非法入侵住宅”罪。

總之，員警的這一次行為，已經對保障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的憲法基幹構成了挑戰，動搖了民主主義的基礎。我們強烈抗議這個壓制行為，並要求立即釋放這三名無辜的市民。

（趙京譯自《橋樑》週刊2004年3月15日第1821號）

世界輿論譴責以色列侵略

格里·傅利

根據歐洲委員會在10月末向《國際先驅論壇》和《EL PAIS》透露的一份調查報告表明：59%的歐洲人認為以色列對於世界和平，比之北朝鮮和伊朗（註），具有更大的威脅性。

根據這一理由，西蒙·威辛塔爾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曾要求歐盟在巴以沖突中，不要參與任何和平談判。

親猶太復國主義的組織爭辯說：研究表明歐洲人在散佈“反猶主義”。

無論如何，由於最近幾個星期以來，以色列逐步升級的暴力行動和軍事威脅，這個猶太復國主義的國家被視為威脅世界和平的首要國家，就不奇怪了。在十月的第一個星期，以色列轟炸設在敘利亞離首都不遠的基地。這次行動，借口敘利亞在其領土上容許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存在，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製造了自殺性爆炸而進行報復。

十分明顯，如果以色列當局堅持敘利亞對巴勒斯坦的自殺性襲擊負有責任，並進行軍事反擊，那就會引來另一場大規模的中東戰爭。無論如何，在邊境同以色列已經發生沖突的Hezbollah游擊隊自從得到伊朗的支持以來，這樣的戰爭就會威脅到這一地區的所有國家，包括最大和人口最多的伊朗在內。

伊朗的新聞界和政治家們認為以色列的核武器基本上是針對伊朗的。因為核武器用於攻擊以色列的鄰國，其放射性塵埃也會落在以色列本土，使自身也受到威脅。調查報告還指出在此期間以色列用核導彈裝備了它的潛水艇。

與此同時，以色列襲擊巴勒斯坦社區變得更加殘暴和粗野。在10月中，以色列軍隊對靠近埃及的加沙地區巴勒斯坦城鎮Rafah發動一次破壞性的襲擊，據說是為了找到偷運武器的地道。

10月13日的英國《衛報》報導說：“在襲擊48小時之後，發現了三條地道，有100多個家庭被火箭導彈摧毀，或者被推土機夷為平地，大約有1500人無家可歸。一架以色列直升機向人群發射導彈，兩個小孩子中彈死亡。軍隊還斷絕向營地供電供水。

城鎮的常住居民曾對《衛報》描述了襲擊的情況：“以色列的士兵一來到便向我們的鄰居開槍。”埃哈德·阿布·塔赫說：“最小的孩子尖聲呼喊，我們試圖逃走。我們不能攜帶任何東

西……。昨天，我的父親就試圖回去，但以色列的士兵還在那里。我們今天回到家裡，家裡什麼東西也沒有了。我們鄰居家的情形也一樣。

《衛報》記者說：“在一些地方，整排整排的房舍被推土機推平了。其他的一些街道，以色列的直升機用導彈一下子便把兩、三個家庭給摧毀了。”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宣稱，以色列這些做法違反了國際法。

此外，以色列還加緊用巡洋艦導彈打擊戰鬥組織的領導人。在10月20日，以色列的直升機向加沙發射導彈，造成14人死亡，其中10人是無辜的旁觀者。逐步升級的這些襲擊受到全世界輿論的關注。由於這些襲擊增加了人們的恐懼感，這顯然是集體懲罰。

同樣是在10年間，以色列政府宣佈在以前占領的巴勒斯坦地區建立幾百個猶太移民的住宅。到3月底，它公佈了一份它自己的新的“安全牆”地圖，認為“安全牆”可以阻止巴勒斯坦恐怖份子進入以色列。這清楚表明，“安全牆”等於把一大批新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強占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甚至美國統治者都感到擔憂，因為這會損害他們曾承諾過巴勒斯坦人擁有自己的國家的信譽。

由於嚴酷的和無情的以色列侵略行徑，世界人民，不祇是歐洲人，把以色列視為世界和平的威脅，這有什麼奇怪？也因此，世界輿論改變了對美國的看法，因為美國就是以色列的老大哥。

巴勒斯坦《耶路撒冷時報》第十期刊登一份民意測驗的結果：96%的巴勒斯坦人不相信華盛頓宣稱支持一個巴勒斯坦國是真誠的。

蔚然譯自《社會主義評論》03年12月號

（譯註：拿以色列同伊朗、北朝鮮作比較是不妥當的。）

殖民地戰爭的動力學

格里·傅利

在伊拉克，一堂殖民地戰爭的動力學正在講授中。襲擊美軍和他的合作者在不斷增加。美軍試圖鎮壓反抗，却愈來愈同當地居民疏遠了。

美國士兵由於自身的不安全，和幹的是使一個文明民族陷於恐懼的討厭工作，使得他們的士氣低落。同美國占領者合作的那些人，發現自己愈來愈被孤立、被藐視、和冒着生命的危險，他們沒有信心和理直氣壯地面對。

10月29日的意大利日報《IL MANIFESTO》說：美國軍隊占領巴格達時，西方國家的民意測驗說明祇有46%的伊拉克人把他們視為侵略者，而現在則有67%伊拉克人認為美國軍隊是侵略者和外國佔領者。這些人來到伊拉克是為了加緊掠奪。

10月31日英國《獨立報》報導說，對美軍的襲擊從9月份以來增加50%。“游擊戰主要是在首都的西部和北部的辛尼地區。美國任命的伊拉克管理委員會的一位領導成員警告說：真正的危險是普通伊拉克人對美國人的憎恨在不斷增長。

薩達姆的庫爾德反對者的一位老戰士告訴《獨立報》說：“伊拉克人一天天變得更仇視美國人了。大多數人都不喜歡他們。……”

他譴責總部設在戒備森嚴的前薩達姆皇宮的，美國提出的臨時聯合當局的官員們，他們從未見到普通的伊拉克人民，完全感受不到人民的感情，他絕望地問道：“在這皇宮高牆後面，你如何能治理這個國家？”

十月末伊斯蘭神聖齋月開始，游擊戰的浪潮一浪接一浪湧來。布殊政府承諾的勝利的調子明顯地減少了，而現在強調的是盡可能快把治安交給伊拉克武裝力量來管。

但，要做到這一點，比解除某一第三世界國家超現代的武器更為困難。首先是信用問題。美國統

治者能夠依靠任何伊拉克的武裝力量去執行他們的命令，而去冒同他們主子翻臉的危險嗎？統治當局也不十分相信伊拉克的警察。而信用問題總是雙方的問題。

貝魯特日報10月29日報導巴格達南邊阿爾·埃蘭警察局的訪問。這個警察局在10月27日受到汽車炸彈的襲擊。報導說：“（受傷）警察綁着綑帶回到他們被炸毀的警察局，痛苦地注意到，他們處在美國人領導的聯盟與越來越發展的游擊隊的戰爭之中，一位名叫納塞爾·哈迪的警察說：「假如我們不同美國人打交道，假如我們有足夠的武器，我們就不會被當作通敵者，這樣的悲劇也就不會發生」。

“美國憲兵站在鐵絲網後面監視着這座樓房時，這位警察注意到他的同事們都轉移到碎石山那邊去了（譯注：指到游擊隊那裡去了）。……美國不帶人進入這座樓房，甚至警察也不行。警察的徽章都給美國沒收去了，所以我們都不能進入警察局去看望我們的同事。美國人就是這樣尊敬我們的啊！”。

10月31日的《獨立報》引述上面所說的訪問報導之後也說到伊拉克警察士氣低落。“受美國控制的行政和治安組織越來越成為襲擊的目標。星期一，巴格達有四個警察局受到自殺性爆炸的襲擊，八個警察被炸死。在阿爾·喀德拉警察局，一個叫安爾·拉希德的警察搖晃着懷中掛着的沖鋒槍，站在汽車爆炸開的深坑旁說：“他們說我拿自己的生命當兒戲，而我每個月祇得到120美元。”

由於阿爾·拉希德受到襲擊，使得巴格達的伊拉克人增長了危機感，認為伊拉克在進入長期動亂的時期，因為美國沒有辦法對付抵抗力量的襲擊。

在美國的當地合作者表現出無意作戰時，美國軍隊的最終失敗便到來了，就如同在越南的失敗那樣。

（蔚然譯）

《建立不同的歐洲需要有不同的歐洲左派》

歐洲左派的社會運動大會宣言

2003年11月間在巴黎郊區聖·丹尼斯舉行的歐洲社會論壇，有超過1500個社團、工會和政治組織為了促進迫切的歐洲社會運動而走到一起來了。據報道有5萬人登記要求參加，有10萬人舉行示威遊行。在此同時，歐洲各反資本主義的左派在巴黎召開了社會運動大會，通過了宣言：《建立不同的歐洲需要有不同的歐洲左派》。這裡所謂的“不同的歐洲”，指的就是：社會主義的民主的歐洲。

(一)對過去社會運動的回顧

宣言首先對社會運動的過去作了回顧。它指出近三年來，成千上萬的工人、男人和女人、青年和老人，在許多基層的社會運動中組織起來了。工會、政黨或者沒有組織的群眾佔領了街區，發起了群眾性的攻擊，有時竟使政府機構陷於癱瘓。“這表明20年來人民群眾第一次對威脅我們生存的戰爭、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這些災禍進行了反擊。”這說明當今世界政治氣候變了，“一個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

宣言指出：“2001年在熱那亞，人們試圖用殘暴的鎮壓來粉碎我們的運動，但我們的運動卻在繼續發展著。2002年11月，來自歐洲各地的六萬青年聚集到佛羅倫薩，為新的歐洲社會運動奠定了基礎，上百萬人舉行遊行示威，向我們的統治者發出警告：不要戰爭，不要侵犯人權；2003年2月15日，全世界有上千萬人進行制止野蠻戰爭的鬥爭。去年在佛羅倫薩，今日在巴黎郊區聖·丹尼斯的歐洲社會論壇，給了這些具有偉大能量和創造性的突發的群眾運動提供了組織形式、社會凝聚力和政治指導。”

宣言要求：“為了世界和平，我們這個星球要行動起來！與歐盟相反，我們按照歐洲特點的全大陸公民投票，從人民群眾中選出另一個歐洲來，那就是建立所有成員國都反對剝削和壓迫的歐洲。”

(二)反對15國秘密制訂的歐盟憲法

宣言明確表示：“我們不要多國公司的歐盟憲法。”“我們要的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公正和和平的人民的歐洲。”

宣言嚴正指出：“15國政府關起門來制訂一部憲法強加在歐洲四億五千萬人民的頭上。那個所謂的‘決議’，是由一個經過嚴格挑選的集團秘密制訂的，違背了歐洲人民制憲的程序，破壞了自17、18世紀民主革命以來的議會政治的傳統。”“大資產階級所要的‘歐洲政府’就是建立在戰爭(1991年伊拉克戰爭、90年代的巴爾幹戰爭和新近美國發動的戰爭)及對蘇聯和東歐的經濟掠奪之上的政府。”

(三)對歐盟憲法的批判

宣言公開宣稱：“我們對歐盟憲法說不，對新自由主義的歐盟說不，這個憲法是危險的。”

“首先，這個憲法認為市場的獨占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它禁止任何侵犯私有財產或市場關係；它拒絕承認一個半世紀以來工人階級經過鬥爭取得的社會成果的合法地位。這些成果是：基本的社會權利、工作條件的立法，勞動合同，工作車間設立工會並有權參與車間事務，工人有罷工、集會、結社的自由權利。”

“第二，這個憲法硬性規定預算將大幅度減少社會福利和砍掉公共經濟政策，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私有化將成為「不可避免」。這樣一來，工業和財政資本將獲得廣闊的有利可圖的活動空間，超級富戶會更加富有，而勞動人民(工人、青年人、失業者、臨時工、婦女和移民等)就會付出代價。在過去的50年間，社會的不平等從未有現在這樣嚴重。”

“第三，憲法加強了歐盟的半專制統治，和不民主的性質。它的真正權力保持在政府(歐盟理事會)手中，歐洲委員會祇掌握次要的責任，歐洲中央銀行完全不受約束，整個是黑箱操作，對誰都不負責任。歐洲議會不能同各國議會相提並論，它的預算安排、

行政人員的選用都不是通過法律手續產生的，這個憲法不承認成員國的民族特性，在領土完整的原則下，拒絕「沒有政府的國家」有權自己作出決定。無可否認，歐盟是個聯合體。有一點是清楚的，即：歐盟的權力並非來自公民或人民，而是來自各國政府。世界真的給弄顛倒了。”

“第四，這個憲法並不承認公民權利，包括居住在成員國中的第三國家公民的選舉權。”

“最後，這個憲法還規定，歐盟的成員國從現在起加強它們的軍事力量，同北約緊密合作。這個法定的義務必定成為軍事聯合企業的滾滾財源。這是一條走向歐洲式軍國主義的路。所謂「歐洲防務」，這是法國、英國和德國為了增強它們的政治意識，和表明它們依傍美國在帝國主義體制內要佔有的地位而已。”

(四)對社會民主黨的批評

宣言指出：“沒有一個自認是左派的人或組織會贊同歐盟憲法的內容，祇有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和綠黨除外；它們對這個憲法說是，他們認為這個憲法雖不是完美的，但是較少的禍害。”

“他們提出三點理由要我們吞下這顆苦果。他們說：歐盟比過去進步，損害它的名譽就會陷入國家主義和歐洲戰爭中去；歐盟，特別是歐洲委員會，是保護歐洲地位的「共同體」的，「所以」，它們幫助歐洲的工會運動；而且，歐盟一定會成為與美國「抗衡」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力量。”

“吞下這顆「較少禍害」的苦果，就會在政治上長出一個惡性腫瘤。”

“社會民主黨已經表示接受歐洲老闆們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和歐盟的所謂穩步發展。政府執行這個方案會導致勞動界和工會運動消沉。我們拒絕在他們的新自由主義綱領的基礎上與社會民主黨一道參加政府。”

“社會民主黨甚至不曾試圖制止這可惡的歐盟的運作，阻止新自由主義的反動改革，和打破這個不民主的歐洲的試驗，它甚至不願在行動上在全歐洲規模上同ETUC(歐洲工會同盟)達成一致。”

“今天，社會民主黨正在試圖消除他們近來造成的政治上的壞影響。貝理雅、施羅德還在掌權，他們還在嘮嘮叨叨說他們的政策是真正的民主政策。但，

勞動人民、婦女、青年、移民們以及我們都沒有忘記社會民主黨使我們遭受的痛苦。”

(五)社會和工人運動的復興

宣言指出：“全球正義運動打破了長達20年的停滯，提出向左轉的選擇和解放遠景。政治上新的一代人築起了街壘，在過去幾年間，在許多國家，包括意大利、法國、英國、希臘和西班牙，上百萬的工人和青年人，肩並肩地舉行反戰的抗議示威。這些運動從一開始便是國際主義的，很快就變成社會的控制點和大多數社會力量和組織的結合點。它促成過去從未有過的世界規模的反戰運動。．．．”

“佛羅倫薩的歐洲社會論壇為新的歐洲社會運動奠定了基礎，今天歐洲社會論壇在有關剝削和婦女壓迫的問題上，開始與富國的勞動界取得了一致。”

(六)對傳統工會領導的批評

歐洲工會同盟(ETUC)中的領導者們是遠遠落在群眾運動的後面了，宣言尖銳地指出：“我們反對跨國公司的國際組織的老闆們，這些傳統工會的領導者在什麼地方召集了群眾了嗎？他們響應了嗎？他們制訂了行動綱領了嗎？號召行動和罷工了嗎？他們提出了什麼戰略？正當2月15日在倫敦、羅馬、巴黎、柏林、布魯塞爾、阿姆斯特丹、馬德里等，歐洲人民都走上街頭的時候，為何這些領導者不號召勞工反對戰爭？我們怎樣才能為不同的歐洲的勝利開展鬥爭？”

“我們需要新的群眾性社會運動和工會運動的更新及新的公民運動。這是戰鬥成功的關鍵。”

(七)關於2004年的歐洲選舉

歐洲社會運動大會的宣言指出：“歐盟憲法是關係到全體歐洲人民的問題，但歐盟卻盡其所能不讓歐洲人民來作出決定，某些政府甚至害怕舉行公民投票。”“事實上，歐盟把賭注押在04年6月的歐洲選舉上，以便把它的計劃偷運過關。”

“我們將從自己的國家開始，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運動，反對歐盟的反動和倒退的憲法，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實行反對資本主義的綱領；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歐洲軍國主義；爭取和平和普遍裁軍。我們的目的是提供各國反對資本主義更廣泛和多元的另一

種選擇，爭取實行歐洲社會運動提出的要求和遠景。”

“如果所有的社會力量通過在街上的抗議示威運動和投票箱的選舉，爭取實現他們的要求和綱領，我們就能夠建立起一個不同的歐洲。”

(八)建立新的歐洲左派

宣言指出：“25年來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程度上第一次出現了世界性的浩大的反對資本主義的國際主義群眾運動。沒有人也沒有那一個政治黨派能夠化解或操縱這股自豪自發的群眾力量。”這表明當今需要有一個新的歐洲左派來領導群眾的鬥爭。

宣言認為：“面對更加富於侵略和反動的傳統右派，面對種族歧視和威脅民主自由的極右派，面對社會自由主義的左翼全都熱衷於統治階級的政策，我們需要作出另一種政治選擇，提高反對資本主義的左派的鬥志，使千千萬萬男女老少的工人和公民們都投身到群眾運動和抗議示威中來。”

宣言宣佈新的歐洲左派的方案，它“反映了不同動因激發的社會運動：包括反對資本主義而保護生態環境的群眾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戰爭的群眾運動；爭取婦女平權和反對種族歧視的群眾運動和國際主義運動等等。”“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和民主的社會制度。在這個社會裏，自下而上進行自我管理，沒有剝削，沒有婦女壓迫，能夠保持持續發展，反對威脅地球生態環境的發展模式，我們的社會方針是：十分關心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我們要求固定的全日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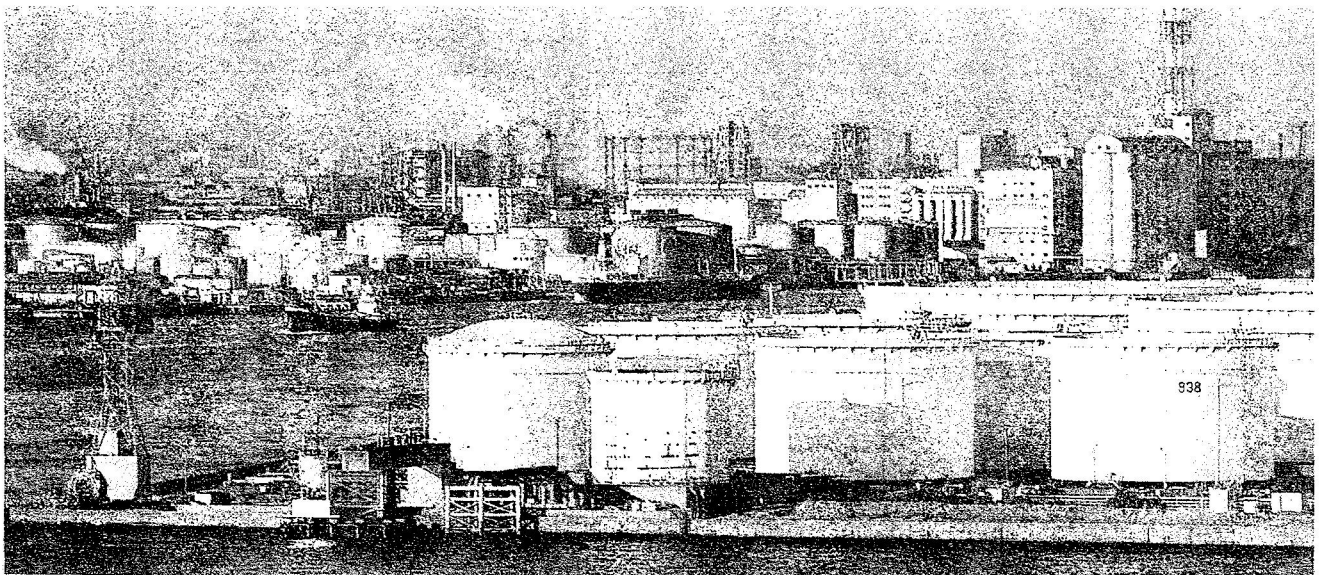
工作，實行最低工資標準，給予失業者、喪失工作能力和退休人員適當的社會津貼，每個人都有住房、教育、職業培訓和優質衛生服務等權利。為此要求廢除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同資本主義決裂，徹底改革政府預算，重新分配資本與勞動之間的財富。總之，為了達到我們的社會目的，我們建議採取必要的反對資本主義的措施，包括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

(九)簽名

在這個歐洲社會運動大會的宣言上簽字的有如下的組織：

蘇格蘭社會主義黨(SSP)
丹麥紅綠聯盟(RGA)
法國革命共產主義同盟(LCR)
葡萄牙左翼集團(Left Bloc)
英國社會主義聯盟(SA)
愛爾蘭社會主義黨集團(SP)
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
英格蘭社會主義黨(SP)
盧森堡左派(LG/DL)
西班牙另類天地(Alternative Space)
西班牙 巴斯克ZuTiK
西班牙加泰隆那亞 聯合與另類左派(UAL)
瑞士團結(SS)
土耳其自由團結黨

(蔚然編譯自《國際觀點》第355期)



群眾抗議八國峰會

潘特

〔編者按：以下兩文，是譯者生前坐在病榻上譯出的，本刊收到後不久，他就非常不幸地病逝了。雖然此兩文譯於去年冬，但仍未失去時間性，更因為了不枉費譯者辛勞地譯出的心血，特予刊出，作為供眾閱覽和對他的紀念。〕

今年6月1日，約有75000到100,000人，在日內瓦和法國、瑞士兩國的較小城鎮示威遊行，反對8國峰會，這8國是7個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加上俄羅斯的國家首腦。8國峰會的地點是法國小鎮埃維昂班（Evian-les-Bains），除了當地居民和峰會的參加者外，對所有的人都是封閉的。

警察對大量的抗議者發起襲擊，有若干人受傷，這使人們回憶起，2年前在日內瓦召開的8國峰會期間，曾有數百人受傷，一名示威者身亡。

布什在峰會內部迫使其他帝國主義領導人，要在美國未來戰爭計劃書上簽字，這計劃可能包括入侵伊朗和北朝鮮。

8國峰會試圖表明，在伊拉克戰爭後，世界帝國主義列強是團結一致的，但伊戰曾遭到德、法及其他歐洲政府和反對——然而，在伊朗和北朝鮮問題上，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新分裂是早已出現了。

峰會發出一份聲明，譴責伊朗和北朝鮮擁有他們所宣稱的核武器項目。倫敦《導報》報道說：“美國的一則消息來源指出，華盛頓已經讀到一份各領導人的聲明，暗示可以授權使用武力來反對違反國際核不擴散規定的國家，但法國總統希拉克稱此為“過份大胆，過份冒失的”聲明。他說：“從來就不曾有過使用武力的談話，我們必須同伊朗採取對話。”

峰會內部的摩擦說明世界各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在開拓新殖民世界的競爭，迄今仍未平息。

抗議者紛紛走上大街，提出不少問題，從全球化到愛滋病。許多人抗議美國佔領伊拉克以及美國未來的戰爭計劃。抗議者來自整個歐洲。

示威遊行離開小城鎮後，留在法國—瑞士邊界上集會。有些示威者還力圖堵住通向埃維昂公路，以便分裂，瓦解峰會。抗議者多次受到襲擊，結果數百人被捕、受傷。

在洛桑，警察利用少數人打碎門窗為借口，對示威者發動襲擊，向和平示威者放射催淚彈和水炮。

（當他們）衝回自己的營地時，警察把兩或三罐催淚彈拋向該城的植物園，這裡到處是抗議者、母親們和孩子們。

抗議者報道說，人們早已看到便衣警官們混到群眾中去，大部份挑釁事件都是他們幹出來的。

在法國和瑞士，對示威者發動的類似襲擊，層出不窮。美國公民馬丁·蕭，試圖阻塞通往日內瓦的一道橋樑時，嚴重受傷了。蕭與另外一個人各自用繩子把自己綁在橋樑上，在橋的兩處高懸空中。一名警察切斷了繩子，蕭便從70英尺高處掉下，多處遭到骨折。在另一種情況下，一組從參加日內瓦大行動回來的示威者，遭到從德國來的警察襲擊。

根據IMC的一份報告：“失去了控制的警察，全身武裝，穿着防暴裝備，開始針對人民進行侮辱，挑動事端，大聲吼叫，拋射催淚彈和觸發式手榴彈。所有這一系列的挑釁是毫無根據的。”

報告繼續寫道：“蓋伊·斯莫爾曼（Guy Smallman），一名攝影師，又是英國的志願者，他被近距離射來的觸發式手榴彈擊中左腿、背部，背部撕裂開了，他需要進行兩小時開刀手術。”

6月1日，星期天晚上，警察襲擊並關閉了日內瓦的獨立媒體中心。據IMC報道透露，31名便衣警察，裝扮成“防暴員”，帶上橘黃色“警察”袖章，事先沒有任何警告，瘋狂地衝到現場，開始用望遠鏡式微型棍棒鞭打志願者，而志願者正試圖與他們對話。一名志願者的頭部被擊中，被送往醫院搶救。

自從西雅圖大行動以來，實際上，所有主要反全球化抗議的和和平示威遊行，遭到反復不斷的襲擊。與此同時，警察早已對反戰示威進行抨擊。

4月7日，在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碼頭上，舉行反戰示威遊行，警察向示威者及碼頭工人投射催淚彈和橡皮彈。為了反對執法情報局開會，最近在西雅圖舉行了示威遊行，警察向和平進軍的群眾發起襲擊，並拋射橡膠彈和噴濺有刺激性胡椒粉。

所有這些襲擊，意在威脅人民群眾不得參加示威遊行，來表達他們對戰爭和其他社會病態的憤恨。儘管有了這種威脅，並把抗議行為不斷提升為一種犯罪行動，但成千上萬群眾仍繼續動員起來，反對戰爭、反對全球化。

（蕭明譯自《社會主義行動》03年6月號）

巴西局勢緊張化 使盧拉站到資產階級一邊

格里·傅利

幾個月前，早在巴西總統競選時，工人黨的候選人盧拉顯然已經把靈魂出賣了，他旨在獲得該國資產階級統治者容許他佔據國民政府的最高位置。

早前，盧拉曾3次參選總統競選，每次都受到右翼分子發動猛烈的運動而加以阻擋。右翼分子看清他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威脅，因為他作為工人鬥爭的領袖，曾獲得傑出的聲望，而且他又是一個宣稱代表全國工人和被壓迫者的黨的創始人。

這次競選，工人黨的歷史性領袖選用了資產階級的直接代表，作他的副總統候選人。另外，盧拉的階級合作主義和候選人名單及選票，只是一個象征，顯然他已給資產階級提出保證，決不反對資本主義制度。

至少，大部份資產階級竟把希望寄托在盧拉身上，因為以前歷屆政府的“自由化企業”政策，已把該國的勞動人民帶到了起來暴動的地步，這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特別是巴西和鄰國阿根廷早已看得很清楚了。現在把長期來一直抱怨的工人階級領袖，任命為總統，就會給他們以機會來轉移被剝削、被壓迫群眾不斷高漲的憤怒情緒。

此外，就任總統的盧拉在國會中是佔壓倒多數資產階級的俘虜。工人黨走在國會中只佔四分之一座位。不可避免的是，為了要履行富豪統治者期望於他的作用，盧拉必須對準工人黨戰友和工會運動實行襲擊了。

工人黨是作為工人階級鬥爭的和窮人的政治代表而建立起來的，因此，右翼分子所強加的“不良社會措施，勢必引起社會爆炸。”

薩巴多（Sabado）等人看到了，把H·海倫娜以及其他工人黨黨員驅逐出國會，則對歷史性形成的黨的生存，產生很大危害性。

“這一行動的意義是明顯的。這將提出一個問題：工人黨退出政府之後，是否能保持言論和行動的自由，是否將成為僅僅是政府的決定在社會上的傳送帶呢？而其代價則是喪失社會的可信性。

事實上，受到威脅的國會中的工人黨黨員，在社會上享受着十分廣泛的支持，而在黨內有可能取得更大支持。由“聖保羅報”，全國最大報紙之一，舉行一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接受調查的百分之五十七的人相信，這三位被驅逐出國會的黨員，是在衛護1987年由盧拉所負責的位置，他們感到有權這樣做。僅有百分之八受調查的人則認為，他們已超越了這個界

限。

社會局勢又再一次緊張化了。最主要的工會總同盟（CUT）很明顯是反對養老金“改革”，而大地主與無地者運動的積極份子之間衝突白熱化了。

戰鬥派的成員

在沒有自我紀律約束的挑戰面前，這三名代表仍然反對盧拉所提出的養老金“改革措施”，改革要求公務員在獲得社會福利之前，還要再工作7年。這一措施是同歐洲各國政府，例如法國和奧地利的建議十分相似，並且曾激發起大規模的抗議罷工和示威游行。

盧拉的“改革”顯然是國際資產階級的一次攻勢。事實上，國際貨幣基金會主席H·科勒（Kohler）早已稱盧拉為“21世紀的政治家了”。

在5月29日刊出的那期從《紅色周刊》上（即第四國際法國支部的周刊），丹尼爾·貝賽德（Bensaid）和法蘭索瓦·薩巴多（Francoie Sabado）兩人已經指出：巴西前幾任新自由主義政府曾試圖強迫執行類似的養老金改革達7年之久，但都徒勞無功，而現在盧拉政府正在制訂的也是這種改革。“這是古典的方案。中、左派現在正受到攻擊，因為他們推行的是倒退的CUT（工會總工會）的方案，CUT代表了該國百分之七十二的有工會組織的工人，但他跟隨盧拉向右轉，並放棄了先前的反對新自由政策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立場。然而反對派終於出現了。

總工會秘書長曾經承諾過，在CUT的戰士們中不准有壓制現象，因為CUT被認為是獨一無二的工會組織，而不是政黨。但看來，一場尖銳的衝突，不可避免地會在下列兩種人之間出現，這就是曾為之獻身一生、而要保持原則的工人戰士們，與自甘放棄原則旨在分享政府所得掠奪物的一份殘羹的工會官僚層之間。

工人黨中最堅定不移的革命者，亦即巴西的第四國際分子，在創建一支明顯反對黨的多數派背叛階級利益的反對派，是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但是他們要同絕大多數的巴西工人及被壓迫者保持聯繫，却是一項艱巨的策略性任務，因為工人及被壓迫者之所以投票支持盧拉，是為了相信他是他們的開路先鋒，他們的先行者，而同時能清除掉他們的政府方針中任何親資產階級政策的模稜兩可的含意。

（蕭明譯自《社會主義行動》03年6月號）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十二）

第九章 托洛茨基與民族問題

曼德爾著 兆立譯

托洛茨基出生在歐洲最大的多族群國家——沙皇時代的俄國。他又在歐洲第二大的多族群國家（奧匈帝國）住了很多年。作為俄國一份自由主義報紙的記者，他在巴爾幹半島各國經歷了各種戰爭。巴爾幹半島是歐洲許多族群雜居、出了極端複雜、至今仍未解決的政治問題的地區。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會對民族問題發生興趣，就是必然的了。

事實上，他對這個問題留意了三十五年。

我們在這裡不能討論所有的、托洛茨基曾採取立場的特定民族問題，也不要按發生先後次序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卻將要看看他的有那些關於民族問題的、最清楚地表達他對這個問題的原則立場的敘述。

在俄國共產黨第十二次黨大會上的民族問題

眾所週知，列寧在他的遺囑上就所謂格魯吉亞問題而寫的話語中，曾準備砲轟斯大林。可能比較少為人所知的是，伴隨著格魯吉亞爭論的、有關於多民族的蘇聯境內各民族之間關係的理論、政治和憲法的爭論。

這是一個從沙皇俄國這樣一個特種類型的殖民大國那裡繼承過來的問題。這種類型的殖民大國的特徵有二：一，它把征服來的地區合併到俄國母國來；二，它用非本土的群體進行局部殖民化。這就使沙皇統治者、他們的代理人（官員、軍隊）、當地統治者、農民們、當地智識階層以及較晚才有的工人們之間有著複雜的社會關係。這些關係本身也受到民族衝突的影響。

要解決這個複雜問題，布爾什維克不得不對他們所需要發展的那種聯邦制國家結構有一個正確瞭解，對殘存的或者新興的民族主義形式有一個正確態度。在第一個情況中，所需要的是，讓蘇聯境內所有民族享有真正的、不只是形式上的權利平等，包括他們的分離權。斯大林原先的蘇聯憲法草案只是建議高加索地區的各共和國依附蘇維埃俄羅斯這個俄羅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這就會給他們比他們已經有的自治還要少的自治）。這個草案是大俄羅斯超級中心化的一個例子，與民族平等的最基本要求相矛盾。〈1〉這個草案受到列寧和托洛茨基嚴厲批評。他們兩人支持在 *Budu Mdivani* 周圍的格魯吉亞共產黨員們的運動。〈2〉斯大林在表面上讓步了，但是並沒有放棄他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觀點。例如列寧的蘇聯主席應該由各民族（俄羅斯、烏克蘭、高加索）輪流擔任的建議並沒有被遵守；加里寧這個大俄羅斯人從1938年開始當主席一直到死（1946年）。

更壞的是斯大林對民族主義的態度。雖然他在第十二次黨大會的演說中批評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把它等同於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說布爾什維克應該反對這兩者。〈3〉斯大林的政策在原則上就是錯誤的，因為它只會導致災難性的政治後果。雖然共產主義者，作為國際主義者，反對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他們卻不把壓迫者民族的民族主義等同於被壓迫者的民族主義。要使這樣一種態度在政治上發揮效力，人們一定要顯示出對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的瞭解和機敏的處事手腕。不這樣做，只會對各加盟共和國中的激進民族主義者有利。斯大林在第十二次黨大會前夜甚至建議把蘇聯的各民族依據經濟發展的程度分為三部份。這個建議是與各民族平等的最基本原則矛盾的。

由於列寧及黨內其他人的壓力，這個建議才被撤回。雖然沒有被通過，在第十二次黨大會上對這個問題提出有原則的立場的，是賴可夫斯基和布哈林兩人。〈4〉說托洛茨基拒絕接受列寧要與他在格魯吉亞和民族問題上結成同盟的建議是不真實的。他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報刊上都為他們的共同觀點辯護。〈5〉他在第十二次黨大會上沒有就這個問題發言，其原因到現在還不清楚。〈6〉

蘇維埃烏克蘭的獨立

最使托洛茨基的同時代的人驚奇的，朋友與敵人都一樣，是他在1939年為烏克蘭獨立的辯護。〈7〉他的文章，《烏克蘭問題》（1939年4月22日所寫的），必須要對著當時的政治背景來讀。希特勒和（納粹德國的）國防軍已經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建成聯繫。烏克蘭問題應該會為納粹向蘇聯進攻的計劃提供接觸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散和喀爾巴阡——烏克蘭的分離之後，納粹控制了一片說烏克蘭語的人口的土地。

在這同時，蘇聯沒有其他地方對斯大林主義獨裁的仇恨像在烏克蘭那樣。這是被農民的流放、接著而來的饑災和加緊的民族壓迫所滋養起來的。〈8〉當時的真正危險是，與納粹合作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會在農村人口中找到同情者。〈9〉在這種情況下，阻止或者打斷這種花招，在政治上是必要的。獨立蘇維埃烏克蘭這個口號正好適合這個目的。

但是，除了這一點以外，它也反映了一個處理烏克蘭問題的更一般的方法。根據托洛茨基的分析，民族問題是使蘇聯人民在政治上再度活躍起來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會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再度爭取到對農民群眾的領導權。他之勇敢地保衛獨立的烏克蘭工人國家，應該成為一個可能使整個蘇聯發生政治革命和更生的推動力。〈10〉

無疑地，將蘇維埃烏克蘭從蘇聯中分開，會表示經濟上的倒退。但是這個倒退在事實上是會與農民群眾的意識相符的，就像1917、1918年的分割大莊園一樣。沒有這樣的妥協，就不可能會重新建立工、農之間的聯盟。托洛茨基於是就得出在今天仍然是如此相關的重要結論：

獨立的工農烏克蘭當然以後會加入蘇維埃聯邦；但是要志願地，而且在它自己可以接受的條件下。這些可以接受的條件又以蘇聯的革命重生為先決條件。〈11〉

這導致托洛茨基得出一個更普遍的結論：這個由十月革命所創立的國家還沒有解決民族問題。〈12〉

托洛茨基把這個困難主要地歸因於客觀環境。他在他的幾篇關於烏克蘭的論文中，只是外表地討論

布爾什維克在主觀上對民族問題所犯的錯誤。這個問題的這個方面對於解決高加索和中亞細亞的各少數民族問題非常重要。〈13〉

托洛茨基在他的最後一本書《斯大林傳》中討論了這個問題，雖然沒有有系統地討論。〈14〉

被斯大林、奧爾忠尼啟則所迫害、被列寧如此有力地保衛的格魯吉亞共產黨員們是托洛茨基的親蜜政治朋友。雖然他與格魯吉亞問題有密切關係，他在他的著作中沒有以像對烏克蘭問題那麼多的篇幅來討論了這個問題。

美國黑人的自決問題

美國共產黨曾費了很多時間努力解決他們對美國黑種人口的態度問題。在所謂第三時期，他們極力主張黑人的自決權和在美國南方建立他們自己的州的權利。他們主張，這個州應該有與美國其他的州同樣的權利。

美國托派內部對這個問題有分歧。一般說來，他們寧願為爭取黑人的社會、經濟、政治的平等而進行鼓動。換句話說，他們並不認為黑人是“少數民族”或“無產階級的盟友”，而是美國無產階級的一個被剝削、被壓迫的組成部份。〈15〉

托洛茨基不同意這個觀點。對他來說，自決權是基本民主權利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份。由於白種工人階級無可否認的種族主義，對黑人而言，對他們的自決權加以某些限制，是不能接受的。我們必須要求，黑人有權利選擇任何政治組織形式：自治、建州或分離。美國黑種人口應該有無限制的自決權。這是那個國家的不斷革命戰略的一個具體元素。〈16〉

對托洛茨基而言，在無限制的自決權與在美國南方建立一個黑人州的要求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在這個問題上，對於黑人作出他們自己的選擇的權利，不應該有限制。讓佔多數的白人向他們強加一個單獨的州，而這個州可能會是一個貧民聚居區，就與企圖不讓他們有選擇權一樣不符合策略。假如大多數黑人要移居到北方各州去，他們應該有權這樣做。〈17〉

南非黑種人口的自決

托洛茨基響亮明確地說出：南非黑種人口應該有自決權，包括建立一個黑人共和國的權利在內。他於1935年在對南非反對派的綱領性文件的回應上寫道：

“從佔多數的黑人立場來看，南非是一個奴隸殖民地。……在這些情況下，南非共和國將首先以一個‘黑人’共和國出現；這當然不排斥給予白人充分的平等，也不排斥這兩個種族之間的似兄弟般的關係——主要地要看白人的行為。但是，完全明顯的是，佔多數的人口，從似奴隸般的依賴情況中解放出來後，會使這個國家具有某種特徵。”

“只要一個勝利的革命將會激進地改變不但階級之間、而且種族之間的關係，只要這個革命將會依據黑人的的人數向他們保證在這個國家中的地位，南非的這個社會革命也將會有民族的特性。”

“我們沒有一點理由向這個問題的這個方面閉上眼睛，也沒有一點理由來減少它的意義。相反地，無產階級政黨應該以文字及行動公開地、勇敢地著手解決這個民族(種族)問題。……”

“當這個綱領說‘黑人共和國’的口號是與‘白人的南非’的口號一樣地對革命事業有害的時候，我們就不能同意這個說法，因為後一口號是支持完全的壓迫，而前一口號只是走向解放的第一步。”

“我們必須決定性地、毫無保留地接受黑人的完全、無條件的獨立權。只有黑、白勞動者共同反對白種剝削者的統治，他們之間的團結才能被培養、被加強。”

“無論如何，對白人的特權和偏見作出最小的讓步也會是革命者的最壞的罪惡。無論誰讓沙文主義的惡魔擺弄，這人就迷失了方向。”

“革命黨必須讓每一個白種工人作出以下的選擇：要麼與英國帝國主義和南非白種資產階級在一起；要麼與黑種工人和農民在一起去反對白種封建地主、奴隸主和他們在工人階級中間的代理人。”〈18〉

當年的這個警告到今天還是有相關性。

(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民族的自決

許多年來，托洛茨基關切西班牙革命的問題，而且曾經許多次對西班牙的民族問題表達他的觀點。1931年，他在革命的前夕寫文章指出，共產黨人應該保衛加泰羅尼亞人的自決權，包括他們從西班牙國家中分離出來的權利。這是一個讓加泰羅尼亞人作民主決定的問題。可是這並不意味著共產黨人應該提出加泰羅尼亞分離的口號。由於整個西班牙都發生了由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由加泰羅尼亞工人階級將他們的宣傳目標朝向建議加泰羅尼亞留在某種形式的西班牙(或伊比利亞)聯邦之內，也許比較可取。托洛茨基是根據他自己的政治判斷才提出這樣一個解決方法的。〈19〉

幾個月以後，在革命爆發之後，他對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民族都表達相似的觀點。托洛茨基堅決主張，如果大多數加泰羅尼亞人或者大多數巴斯克人表達了要完全分離的意願的話，無產階級先鋒隊應該充分而完全地保衛他們獨立地組織他們的國家生活的權利，但是他認為，在西班牙聯邦之內擴大民族地區的自治，會使工人與農民得到很大的利益。〈20〉

托洛茨基這個立場是更加重要的，因為西班牙共產主義運動的較大部份、毛林(Joaquin Maurin)所領導的加泰羅尼亞同盟，由於過分著重民族問題，威脅著要與西班牙先鋒隊的其他部份分離。〈21〉這個做法就會有非常壞的後果，因為，在那個時候，西班牙左派反對派的多數派已經與毛林的組織合併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因此會失去了影響加泰羅尼亞以外的工人階級中的廣大左傾部份的機會。

主張成立巴爾幹聯邦

托洛茨基於1912—1913年在巴爾幹半島停留的時候，已對該地區的爆炸性的民族問題有第一手經驗。他在1909年已經主張將巴爾幹半島轉變為一個由所有分散的民族組成的民主聯邦。〈22〉他因為土耳其青年黨拒絕接受這樣一個解決方法而譴責他們的大國沙文主義。

在往後的年月中，他時常重提這個口號的至關重要性。〈23〉在導致馬其頓被分割的布加勒斯特和約

以後，他為了經濟以及民族的理由，又極力主張成立一個由巴爾幹半島各國組成的聯邦。〈24〉

在共產國際的早期，由於巴爾幹聯邦這個要求曾經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該地區的各社會主義者的傳統立場，所以共產國際採納了這個口號。後來，在斯大林的壓力下，這個要求被刪掉了，產生了衆所周知的悲慘結果，因為這些國家的官僚機構的不同派系互相以其領土要求激起民族情緒，促進戰前各反動民族主義潮流的興起。

奧匈君主國內的民族問題

托洛茨基沒有對奧匈君主國內的民族(nationality)問題作出特別研究。可是，他在他的《俄國革命史》中討論民族(national)問題的一章中，以一節的篇幅，討論舊奧匈國內的民族問題。與他對其他國家的民族問題的著作不同，這一節是一個比較有系統、理論性較高的分析，因此值得我們加以細心研究。托洛茨基首先評論說，在像土耳其、俄國和奧匈國等族群雜多的國家中，資產階級革命的過遲到來，曾經激發了強有力的離心力，因為它利用了民族統一作為一個基本的工業儲備力量。〈25〉

他接著說：

“布爾什維主義是以今後幾十年內不斷爆發民族革命這個假設為根據的。它以這個精神教育先進工人們。奧地利的社會民主主義卻恰恰相反。它卑躬屈膝地使自己適應各統治階級的政策；它保衛奧匈君主國內的一個民族的強制公民資格，而且在這同時，由於絕對沒有能力實現這些不同族群的工人們的革命聯合，卻依據垂直分離法在黨與工會之內將他們隔開。一位名叫卡爾·雷內爾，受過教育的哈布斯堡王朝官員，從來不厭倦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墨水池中探索、尋求一些使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起死回生的方法——直至有一天他發現自己成為奧匈君主國的孤寂的理論家。當各個中央帝國都被擊垮的時候，哈布斯堡王朝又試圖舉起一面在它的懷疑者推動下成立一個自治民族聯邦的旗幟。……”

“此外尚有奧托·鮑厄爾，代表著奧地利社會民主主義的“左”翼，認為這是一個合適的時機來提出

民族自決的公式。那個綱領在前幾十年中應該可以激起無產階級進行反對哈布斯堡和統治資產階級的鬥爭。這個綱領在現在卻被引進為能使以下這個民族自我保存的工具。這個民族，在昨天曾佔統治地位，可是在今天卻有來自解放了的斯拉夫人民那一邊的危險。……”

“1918年10月3日，當這件事情一點都不再依靠他們的時候，德國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議員們崇高地‘承認’前帝國各民族有自決的權利。10月4日，各資產階級政黨也採納了自決的綱領。就這樣超前了奧地利—德國帝國主義者一天以後，社會民主黨人馬上倒回他們的等待政策。只在10月13日，當軍隊和王朝確定性的崩潰創造了奧托·鮑厄爾所說的‘我們的綱領所要啟動的革命局勢’的時候，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們才在實際情況中提出了自決的問題。真實地說來，他們現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損失了。……”

“因此，這個新綱領能被流傳的原因，倒不是它對被壓迫者有用，而是它對壓迫者不再有危險了。有產階級，因歷史因素被推入困境之後，已發現自己不得不在法律上承認民族革命，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卻發現這是一個合適的時機使它在理論上合法化。他們說，這已是一個成熟的、被及時地符合歷史進程地準備的革命——不過它現在已完全結束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精神就在我們眼前，好像在我們的手掌之中一樣。〈26〉”

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接受雙重君主制的方式不但對它的民族自決政策有悲慘的結果。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甚至在大戰之中，他們仍贊成併吞。當他們於1918年在奧托·鮑厄爾的壓力下改變他們的自決路線的時候，這在事實上意味著轉移到與德意志帝國聯合的方向，因此，對他們不能在1918—1919年的革命前夜時期促進社會主義的轉變，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27〉

註釋：

〈1〉 見列寧致政治局的1922年9月26日及27日的信，也見收集在《列寧全集》第36卷中的他的遺囑的第一部份。Ditte Geyns所著的《Nationali taten politik der

Bolsheviks】《布爾什維克的民族政策》(杜塞爾多夫市 1988 年版)從第 380 頁開始對這個爭論有一個很好的一般記述。

〈2〉 見托洛茨基的《斯大林傳》，倫敦 1969 年版，第 2 卷，從第 170 頁開始；也見《托洛茨基自傳》，紐約 1960 年版，第 482—486 頁。

〈3〉 Gerns, 《布爾什維克的民族政策》，從第 429 頁開始。

〈4〉 賴可夫斯基對第十二次黨大會的演說詞是收集在《賴可夫斯基於 1923 年—1930 年在蘇聯的反對意見選輯》，(倫敦 1980 年版)中。也見 Pierre Broue, 《Trotsky》，巴黎 1988 年版，從第 326 頁開始。

〈5〉 特別見 Moshe Lewn 的《列寧的最後一次鬥爭》，倫敦 1975 年版。

〈6〉 我們已在本書第三章討論過這個問題。

〈7〉 見《托洛茨基 1938—1939 年論文集》中“烏克蘭問題”一文(從第 301 頁開始)。

〈8〉 烏克蘭共產黨書記 Skripnik 被指控為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於 1933 年以自殺來抗議。

〈9〉 在 1941 年夏天，在納粹進攻的早期，在他們知道納粹罪惡的全情之前，許多烏克蘭農民，對佔領軍同情，與工人不同。

〈10〉 波羅的海各加盟共和國在 Glasnost[開放]開始以後的群眾運動證實了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

〈11〉 見“烏克蘭問題”一文，第 305—306 頁。

〈12〉 見《托洛茨基 1939—1940 年論文集》中“Independence of Ukraine and sectarian Muddleheads”[“烏克蘭的獨立與宗派主義的糊塗蟲”]一文(1939 年 7 月 30 日)，第 47 頁。

〈13〉 這段歷史的一個有極大吸引力，但未被適當地澄清的部份與 Sultan Galiev 這位佔領導地位的亞洲布爾什維克有關。他認為蘇聯的中亞細亞部份的共產黨人在組織上應該有自治權。他後來被開除。斯大林派的人說他是“亞洲的托洛茨基”(見 Alexandre Bennigsen 和 Chantal Lemercier Quelquejay 合著的《Sultan Galiev》，巴黎 1986 年版)。我們不知道托洛茨基對 Sultan Galiev 的看法是怎樣。

〈14〉 《斯大林傳》，從第 170 頁開始。

〈15〉 托洛茨基，《論黑人民族主義和自決》，紐約 1978 年版。

〈16〉 同上書，第 25—26 頁。

〈17〉 同上書，第 45—48 頁

〈18〉 《托洛茨基論文集 1934—1935 年》，紐約 1977 年版，第 248—253 頁。

〈19〉 托洛茨基，《西班牙革命》，紐約 1973 年版，第 60—61 頁。

〈20〉 同上書，第 77—78 頁。

〈21〉 同上書，第 107 頁。

〈22〉 托洛茨基，《巴爾幹戰爭》，紐約 1980 年版，第 12 頁。

〈23〉 同上書，第 41 頁。

〈24〉 同上書，第 366—367 頁。

〈25〉 《俄國革命史》，倫敦 1967 年版，第三卷，從第 53 頁開始。

〈26〉 同上書，第 59—60 頁。

〈27〉 Peter Kulemann, 《Am Beispiel des Austro marxismus》[《論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典型》]，漢堡 1979 年版。

(continued from p.35)

Corruption is a well known problem that has accompanied the reform towards capitalism. While there are more prosecutions of corruption cases (for 2003, there were 18,515 major cases, and 123 cases involved over 10 million yuan), corruption has become almost universal. Cheng Wenhao, a scholar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studying corruption, pointed out the four new trends of corruption: going collective; the means becoming more invisible; more sophisticated in terms of tact and cleverness; going international.⁴ Of the 109 experts in various fields recently interview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0.4% acknowledged the hidden worries, 34.9% believed that some sections of the masses feel they have suffered a loss, and 73.4% thought that party and state officials are seen as having benefited most from the current reform. Only 1 expert (0.9%) believed that manual workers and peasants have gained from the process. Such views indicate the trend of social polarization, concluded the survey.⁵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ruling bloc and the people are ever aggravating.

5 April 2004

¹ Cited by Ming Pao, 2 March 2004.

² Wen Wei Po, 3 January 2004.

³ Wen Wei Po, 4 March 2004.

⁴ Wen Wei Po, 11 March 2004.

⁵ Wen Wei Po, 24 February 2004.

Abusive consequences of China going capitalism are aggravating

Zhang Kai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10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at was held in March 2004 made some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The clause "citizens' legitimate private property will not be violated" is added to further defend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inheritance right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itution describes private capitalists as "constructors of the socialist cause", and deletes the attribute "exploiters". Such amendments indicate an all-out go for capitalism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a near completion of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 China.

State property, as non-capitalist element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finds its weight and role ever decreasing. In a recent National State Property Monitoring Working Committee Meeting, it was stressed that the reform of the management of state property and reform of state enterprises should be accelerated, and the shareholding system of state enterprises should be furthered. Such a shareholding system reform (with absorption of foreign capital, merging, etc.) applies to most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except a small minority of enterprises such as those on military production.

Currently, the weight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GDP is about 30%. Zhang Zhuoyuan, researcher of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oposed that it can be further reduced to 20% in his speech to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On February 1, 2004,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a directive for a greater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market, for expansion of direct investments, and for the market playing a greater role in resource distribution. The directive encouraged investors to take a bigger share in economic gains, and fund management companie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to become leading forces in the capital market.

Ma Kai, director of Development and Reform, gave a report to the NPC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2003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on the planning for 2004. He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hat must not be overlooked in ou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ot only that some deep-structured contradictions accumulated over the years have not been resolved, new problems have arisen. Firstly, peasants' incomes have found difficulties in increasing, and grain production has decreased. The increase rate of peasants' net income has reduced by 0.5%, and grain output has decreased by 26.4 billion kg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Secondly, the unemployment issue is serious. There are still 14 million urban workers displaced from their jobs or unemployed, and new urban labour force this year is estimated to be 10 million. This does not count large numbers of rural and surplus labour. Thirdly, income discrepancies are acute, and low income rural and urban households face difficult livelihood. Fourthly, there are structural economic imbalances, and some professions and regions suffer from arbitrary investments, repetitive low-quality construction, wastefulness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stress in the provision of coal, electricity, fuel and transport. Fifthly, there is imbalanc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adequacy in public health, sanitation, and rural education. Sixthly, market economic order is rather chaotic, social credit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and serious industrial hazards are frequent.

Indeed, the increase in peasants' income has been dropping. According to official statistics, the increase was 9% in 1996, but dropped to 4.3% in 2003, and much of this increase has been due to migrant work that the peasants take

up in the cities. As a contrast, in the last 25 years, China's GDP has risen from 362.4 billion yuan in 1978 to 11,669 billion yuan in 2003, and per capita GDP has risen from 379 yuan to 8,469 yuan.

Peasants' interests have been violated in other manners. The expansion of urban and industrial projects means that peasants have lost their land at a cheap price.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 of the official magazine *Chinese Earth*,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peasants' farmland appropriated by various levels of government totalled over 6 million hectares, and after deducting the compensation paid to peasants, the land assets appropriated from peasants equalled over 2,000 billion yuan.¹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People's Daily* of February 2, landless peasants in China today number around 40 million, with an annual increase of about 2 million.

Other problems about peasants' plight have surfaced. With 130 million surplus rural labour, most have been forced to seek jobs in the cities.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wages owed to rural labourers is around 100 billion yuan.² Up to February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has successfully recovered 25 billion yuan of wages for rural labourers. In terms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while the rural population is 70%, there are only 1.9%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eputies that have rural residence, that is, 56 out of over 2,900 people's deputies. Peking University scholar Gong Renren said that it is only in China that ope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asants exists in the election laws.

The plight of peasants finds manifestation in the decrease in arable land and grain output. In 2003 alone, 2% of arable land was lost over the 126 million hectares of 2002. While grain production reached the peak of 512 million tons in 1998, it has steadily decreased in the last five years, and totalled 431 million tons in 2003. This means per capita grain output has dropped from 414 kg in 1996 to 333 kg in 2003.³

The unemployment question continues to trouble China. This year, the newly increased unemployed population is 24 million (14 million displaced from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nd 10 million new urban labourers), and this does not include the 100 million migrant workers from rural areas, and the 150 million surplus rural labour. According to a survey of 1,500 people from 10 major cities in China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Institute during February this year, the three issues interviewees were most concerned with are employment and re-employment (98.8%), social security (96.1%), and corruption (94.1%).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has gone more acute. In 2003, the Gini Coefficient in China has gone above the caution figure of 0.4. 20% of the richest urban households owned 66% of financial assets, while the 20% poorest urban households owned only 1.3% of the assets. It is pointed out by many scholars in China that the urban-rural income discrepancy in China may be the most serious in the world, with average urban income being five to six times that of average rural income. According to a study by *South Daily*, in Shenzhen, two years ago, the 10% highest income households had a per capita income of 68,428.80 yuan, whereas the lowest 10% income households had a per capita income of 6,662.04 yuan; the discrepancy was 9.2 times. Last year, the figures were 75,657.60 yuan and 5,212.32 yuan, the discrepancy being 13.5 times. These are some consequenc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s in China.

(to be continued on p.34)

香港	2	人大釋法之後.....	仲明
	4	中央收緊港人的自由權利.....	振言
	5	最低工資保障工人權益.....	微波
台灣	6	台灣總統大選評析.....	軍行
中國	8	「六四」十五週年看新的鬥爭.....	張開
	11	雲不能永遠遮住陽光 ——就蔣彥永醫生要求正名“六四”告全國同胞 (轉載).....	全美學自聯
	12	關於支持民運人楊建利牢中絕食的聲明 (轉載) .. 中國民運海外聯席會議澳洲分部	
	13	資本主義化帶來日增的惡果.....	張開
	19	北京見聞.....	楊萍
悼念	20	永遠懷念周仁生戰士 (1922—2004).....	十月評論社同人
	21	周仁生同志傳略.....	沈雲芬・周履鏘
國際	22	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政府犯罪為合法.....	松本龍雄
	22	強烈抗議立川警署與東京警視廳壓制言論自由.....	趙京譯
	23	世界輿論譴責以色列侵略.....	格里・傅利
	24	殖民地戰爭的動力學.....	格里・傅利
	25	建立不同的歐洲需要有不同的歐洲左派.....	歐洲14個左派組織
	28	群眾抗議八國峰會.....	潘特
	29	巴西局勢緊張化使盧拉站到資產階級一邊.....	格里・傅利
特譯	30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十二) 第九章：托洛茨基與民族問題.....	曼德爾
英譯	35	Abusive consequences of China going capitalism are aggravating.....	Zhang Kai

OCTOBER REVIEW

VOL.31 No.1

30 April 2004

HONG KONG

- 2 After NPC interpreted the Basic Law..... Zhong Ming
4 CCP tightens up freedoms of HK people Zhen Yan
5 Minimum wage to defend workers' interests!.. Wei Bo

TAIWAN

- 6 On the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Jun Xing

CHINA

- 8 Struggles at 15th anniversary of June 4 Zhang Kai
11 The dark clouds cannot forever shade the sunlight
-- on Dr. Jiang Yanyong's demand for rehabilitating
June 4 (reprint) Autonomous Students' Union in US
12 Statement on democracy fighter Yang Jianli's hunger
strike in jail (reprint) .. Overseas Coalition-Australia
13 Abusive consequences of China going capitalism are
aggravating Zhang Kai
19 What I saw in Beijing Yang Ping

OBITUARY

- 20 In memory of fighter Zhou Rensheng (1922-2004)
..... October Review
21 Biography of Zhou Rensheng YF Shen, LC Zhou

INTERNATIONAL

- 22 Japanese supreme court rules unlawful acts by
government as lawful..... Matsumoto Takio
22 Protest against Tokyo police bureau for repressing
freedom of speech (tr) Zhao Jing
23 World opinion condemns Israeli aggression .. G Foley
24 The dynamics of colonialist war Gerry Foley
25 Europe: a different Europe is possible!
-- Resolution of Assembly of the Social Movement
28 G-8 summit met by mass protests Dave Bernt
29 As tensions rise in Brazil, Lula sides with capitalists
..... Gerry Foley

SPECIAL ARTICLE

- 30 Trotsky as alternative (Chapter 9) Ernest Mandel

ARTICLE IN ENGLISH

- 35 Abusive consequences of China going capitalism are
aggravating Zhang Kai